

76年1月
45919

革命文物

上海社會科學院
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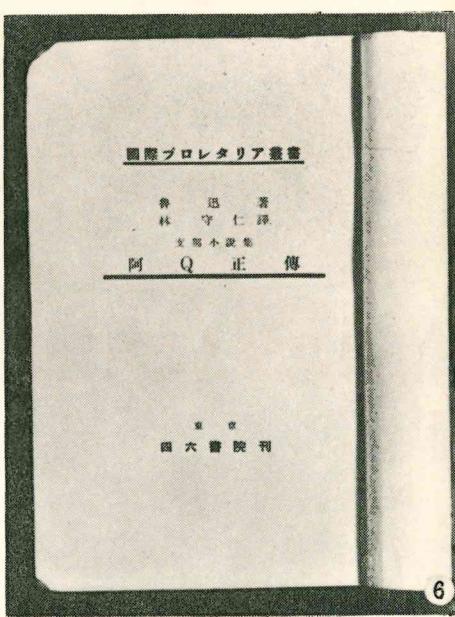
GEMING WENWU

1

1976

憤于長夜過春時
挈婦將雏艱
有深夢裏依稀
慈母淚城頭
行大三旗忍看朋輩
成冤鬼忽向刀邊覽
小詩吟罷汎肩乞寫
靈刀光如水照綰衣

三月
一日晴星期休恩午從弟二弟及子平出得為市閒步以至留禁風
寶小館四枝日梁邑父邑長子舊地又尚開小通一枚廿二元
二日寒日往郢中候娶徐吉軒同至國子監以九教會中人舉行之餘也其舉止嚴
肅極一博數遷至胡徑之處小坐而歸日暮半失後小雨即寄見望學二弟
信并兩序此百命兄書之於正月三日金仰之草二十一年是(五)



二十八日星期休息文先生私生子也昨往濟大今幹道往周易監上頌疏外席已薄然累之時
往視之劉主僕僅五個人或跪或立或跪主而笑候余故之從弟大聲而傷咳斜問便知辛之事
真甚誰聞山呼由夏德卿主飭陰驚丁畏也歸途昌黎者山家小坐助過旅宿協和方舟
李布主屬出復邀之同往至午歸予手小燈吸烟于監室東南一方嘗佩春即去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讯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 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讯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

(付在“革命的詩” no.1 (76年))

伟大的胜利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采取的反修防修、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大措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

喜讯传来，大快人心。首都沸腾了，全国沸腾了。亿万军民游行庆祝，锣鼓喧天，欢声雷动。各地纷纷举行盛大的集会，致电毛主席、党中央，热烈拥护、坚决支持这两项英明决策。全国出现了一派团结战斗，把反击右倾翻案风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革命景象。

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长期以来，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一起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群众批判，他表示愿意悔改，“永不翻案”。毛主席挽救他，给他重新工作的机会。但是，他辜负了毛主席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一旦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便旧病复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带头煽起了右倾翻案风。

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邓小平的翻案活动，从去年十月开始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毛主席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主席的指示击中了邓小平的要害，揭露了他的反动阶级本质。

正当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遵照毛主席指示，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些反革命分子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邓小平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赞扬。党中央根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从反面给我们上了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课。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门，三是烧汽车，烧房子，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人民解放军，打革命群众，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它还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又是多么复杂。这些反革命分子不择手段，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制造政治谣言，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词，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集团，欺骗群众，制

造事端，何等阴险恶毒！它也告诉我们：广大人民是要革命的，对这些反革命分子是深恶痛绝的。不管一小撮阶级敌人多么猖狂，在革命群众面前，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终究不堪一击，顷刻瓦解！

党中央的两项决议，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必将推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我们一定要把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火力批邓，批判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要提高革命警惕，随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看到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还会进行垂死挣扎，对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上当受骗的人要进行教育，做好思想工作。

让我们团结起来，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

热烈欢呼毛主席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项决议 愤怒声讨邓小平的反动罪行

本刊四月十日讯 中共中央两项重要决议发表以后，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系统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群情激奋，欢欣鼓舞，斗志昂扬，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连日来，他们反复收听广播，认真学习讨论中共中央两项决议。他们和首都人民在一起，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纷纷贴大标语，写大字报，举行集会，上街游行，热烈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两项决议，愤怒声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动罪行，愤怒声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罪行。他们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更深入地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各单位呈现出一派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

四月九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在这次反革命事件中多次被反革命暴徒冲击的历史博物馆的大礼堂，召开了文物局系统各单位热烈欢呼中共中央两项英明决议，愤怒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大会。在会上发言的有文物局负责同志和各单位的群众代表。

发言的同志一致指出：中共中央两项决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充分表达了全

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对资产阶级和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沉重打击，是反修防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措施。同志们愤怒声讨邓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控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表示坚决同全国人民一起，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会上，群情振奋，豪情满怀，热烈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热烈庆祝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热烈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同志们在发言中指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胜利开展的大好形势下，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于四月上旬，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书写反动诗词，张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发表反动演说，煽动搞反革命集团。他们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的大方向。到了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中国历史博物馆地处天安门广场，四月五日曾受到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四次冲击，打伤了馆里的干部。面对这股反革命逆流，历史博物馆的广大革命职工，和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一起，夜以继日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的代表在会上用亲身经历揭露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暴行。被反革命暴徒打伤的女干部胡滨同志说：“四月五日十一点多钟，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冲进我们历史博物馆时，我上前阻挡，几个暴徒立即对我拳打脚踢，把我的腿打伤了，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工人张永生同志说：“那天下午，我亲眼看到了这伙反革命分子的暴行，他们疯狂地烧毁了停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一辆上海牌小汽车；又用石头把天安门广场警卫战士的小灰楼营房的玻璃窗全部砸坏；又砸了门，冲进营房，把里面的被子、床单、衣服、收音机和家具统统往火里扔；放在宿舍里的手表、人民币等都被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洗劫一空。这时，有一个坏家伙在树上嘶叫：‘烧楼’，暴徒们就点火烧着了这座营房。他们还狂妄叫嚣：‘谁救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不仅不准救火，还用斧头砸坏消防车的驾驶室，打伤消防人员。目睹这伙暴徒的罪行，在场的革命群众无不个个义愤填膺。对这一伙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誓做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硬骨头，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用战斗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会上发言的同志还指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邓小平拼命鼓吹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统统是骗人的鬼话。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事实证明：邓小平就是一切反动阶级的总代表。他散布的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其实不过是掩盖他们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烟幕。

最后大家表示：一定要把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对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深入揭发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大家还表示：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一定要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充分做好各种准备，坚决粉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一切阴谋破坏活动；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实际行动，发展革命大好形势，把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会后，与会同志还举行了示威游行。

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目录

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学习鲁迅 反击右倾翻案风

坚决批判投降派 永做革命硬骨头

——学习鲁迅评《水浒》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韬真 (1)

辛亥革命后几年间鲁迅的反尊孔、反复辟斗争 师鲁 (4)

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

——谈鲁迅为《阿Q正传》日译本所写的校释 戈宝权 (9)

友谊的选择——读鲁迅给山上正义的信 唐弢 (14)

发扬革命传统 批资批修

对右倾翻案风的一个有力驳斥——河南省部分地区开展

群众性革命文物工作见闻.....常成宝 余 波(18)

糠窝窝精神永不忘.....河南省清丰县大屯公社东纪庄大队党支部(25)

两个“务必”牢牢记 革命传统代代传

——北京卫戍区某部一连发扬革命传统的几个故事

.....北京卫戍区五一〇一部队报道组(29)

向革命先烈学习

为真理而斗争的勇士

——记革命烈士郭纲琳.....南京市雨花台烈士史料陈列室(34)

革命的遗嘱——读江竹筠烈士狱中遗书

.....北京市通县马头公社下乡知识青年评论组(39)

不 忘 阶 级 苦

血迹斑斑的图画

——介绍大连寺儿沟的“红房子”.....旅大市三十五中学党支部(42)

红军灯.....鹤 文(24)

红军衣.....广西师范学院政治系七四年级学生 蔡向阳(46)

封二 图 片 说 明

① 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诗手迹。

②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三事》手迹。

③ 鲁迅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手迹。

④ 鲁迅一九一四年三月二日日记手迹。

⑤、⑥ 《阿Q正传》日译本(山上正义译)

封面和扉页。

坚决批判投降派 永做革命硬骨头

——学习鲁迅评《水浒》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韬 真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在这里不仅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还指出了投降派可以起反面教员的作用。

为什么说《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呢？因为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鲁迅先生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在封建皇权内部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很明显，如果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起义就是假的，而且必然走向投降，这是历史的经验。鲁迅正是抓住了这个主要之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的要害问题是受招安，即投降。

《水浒》这部书，作为反面教材，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例如，它也写了一些反抗的故事，但从来不反皇帝；晁盖、李逵等是反皇帝的，而在《水浒》中却是以他们反抗的失败来反衬宋江“替天行道”的胜利。它也暴露了一些贪官的昏庸，但把皇帝说成是“至圣至明”。它明明写宋江接受招安，向封建皇帝屈膝投降，但把这种行为说成是“上承天命”、“辅国安民”。它自始至终充满了孔孟之道的反动说教，但把这种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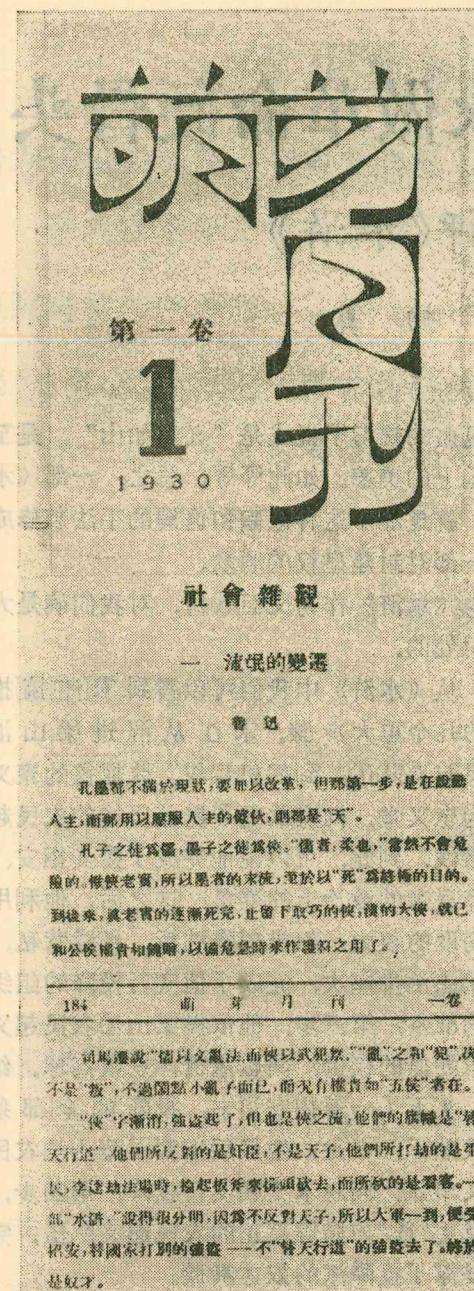
不见血的软刀子说成是“义重如山”，是至高无上的美德。如此等等。总之，一部《水浒》就是靠了这种欺骗和诡辩的手法装修成的一部对封建皇权的颂歌。

《水浒》作为反面教材，对我们确是大有用处的。

从《水浒》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江搞投降的几个重大步骤。宋江从混进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到伺机篡权、改晁盖的聚义厅为忠义堂，彻底改变了晁盖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到此，可以说他完成了接受招安、投降皇帝的政治上的准备；这之后，他利用已窃取的权力，积极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到梁山泊排座次，完成了他实行投降的组织上的准备；第三步，他依靠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的血的代价，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结果，买下了一道招安诏书，投降的全部条件成熟了，于是，他最后出卖了梁山泊农民起义事业，向赵宋王朝实行投降；第四步，他就去“征”方腊等真正的农民起义队伍，完全暴露了投降派的奴才嘴脸。

鲁迅论《水浒》的这一段精辟的评论，扼要而深入地揭示了上述宋江投降的全过程，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贯穿《水浒》全书的这条投降主义的黑线。

不反天子——接受招安——“为王前驱”，这可以说是历史上许多投降派的三部曲。《水浒》中的宋江是这样，太平天国后期的李秀成也是这样。李秀成早在自己管辖苏



图一 初次发表在《萌芽》月刊上的《流民的变迁》。王明、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头子，也没有一个例外。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维护反动的剥削制度。因此，剥削阶级一招手，帝国主义一施加影响，他们就摇头摆尾，接受“招安”，出卖革命。所以鲁迅揭露的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带规律性、普遍性的。鲁迅在这里解剖的是《水浒》，是宋江。我们要学习的却是从宋江这个反面典型来识别一切投降派。

鲁迅对《水浒》宣扬投降这个要害问题，看得如此深刻有力，应该说，是同他一生的战斗经历分不开的。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鲁迅在对敌斗争中就注意识别和揭露形形色色的投降派，并发挥了硬骨头精神。当时，鲁迅正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就在“四·一二”事变之后的第三天，即四月十五日，广州也开始了反革命的大屠杀，单在中大，就有不少革命青年被捕。鲁迅就在当日亲赴中大的紧急校务会议，多方营救被捕青年，无效，愤而辞去一切教职，以示对反动当局的强烈抗议。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不但没有把他吓倒，相反，正是由于这次血的教训，他终于彻底转变到了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成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同时，在这次血的教训中，他还看到了现实斗争中的“大军一到，便受招安”的血淋淋的事实；那些老少投降派，“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这使他认清了某一类政治“奸商”的卑鄙面目。鲁迅指出，这些人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但是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这里暴露的，难道不是那些现代的宋江吗？显然，从这些现代的宋江身上，同样也是有助于作者去认识古代的宋江的。

一九二七年九月，鲁迅由广州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一生中的最光辉的战斗生涯。从这时起，直到他一九三六年十月逝世止，这

一时期，正是国共两党在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上激烈斗争的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当时，国民党在文化界实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动员了包括文氓、侦探、走狗、刽子手等在内的各色反革命大军，采用了从封闭书店、禁止刊物、删改文稿到杀戮作者等各项反革命措施，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化运动进行疯狂的“围剿”。这是一个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更加反动和更加黑暗的时期，尤其对于鲁迅，敌人更是恨、怕交集，竭尽所能地加以迫害。正如鲁迅在一封信里指出的那样：“权力者的砍杀我，确是费尽心力，而且他们有叭儿狗，所以比北洋军阀更周密，更厉害。”但是，疾风知劲草，正是在这种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年代，鲁迅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概，捍卫和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紧密地配合了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敌人的文化“围剿”失败了，“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值得指出的是，鲁迅那篇揭露了《水浒》的要害问题是投降的《流民的变迁》，正是发表在三十年代初期。在革命和反革命、投降和反投降激烈搏斗的整个三十年代，鲁迅这篇文章既是批判投降主义的战斗檄文，也是鼓励革命者勇猛进军的号角。文章通篇闪耀着不可逼视的战斗光芒，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正因为这样，我们读着它的时候，才深深感到作者在字里行间，对于《水浒》中的投降派和现实中的降投派，正是一箭双雕的，批判前者的着眼点在于揭露后者。

鲁迅是战斗者，他不仅用自己的笔，更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坚决批判投降

派、永做革命硬骨头的光辉榜样。可以说，在鲁迅整个战斗的一生，尤其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三十年代，他始终是站在战士的血迹中呼啸着前进的。一九三〇年二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即以此为由，呈准国民党南京政府明令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于是就有人劝说鲁迅发表声明，退出该组织。鲁迅的回答是：“我用硬工对付，决不声明……”这年三月，鲁迅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向敌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摆开了新的反击阵势。一九三一年二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将柔石、殷夫等五位左翼作家秘密枪杀于龙华，鲁迅处境也很危险，曾和全家离寓避难。当五作家被秘密枪杀的消息传来后，他悲愤异常，在深夜的客栈里，吟出了那首“惯于长夜过春时”的战斗诗篇，“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封二：1），这就是他在这种白色恐怖下发出肺腑的革命誓言！

为了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任意蹂躏人权、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并支援狱中的革命者，一九三三年一月，鲁迅又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六月十八日，杨杏佛即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并盛传鲁迅也上了黑名单。六月二十日在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举行送殓大会，鲁迅不顾友人劝阻，毅然参加，且出门不带钥匙，以示牺牲的决心。七月三日，上海某小报上又别有用心地放风，说什么由于“最近上海暗杀之风甚盛”，使得“左翼作家纷纷离沪”，“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并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据确信，鲁迅赴青岛”云云。对此种无耻的诽谤，鲁迅给予了辛辣的回击：“杨杏佛一死，别人也不会突然怕热起来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枝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总之，在那“造谣生事，害人卖友”，被一些无耻文人“视若当然”的白色恐怖气氛下，鲁迅是一株独立支

（下转28页）

辛亥革命后几年间鲁迅的反尊孔、反复辟斗争

师

鲁

孔孟之道就是复辟倒退之道。尊孔和复辟倒退总是连在一起的。在我国，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凡是主张复辟倒退的必然是尊孔派，凡是主张革新前进的必然是反尊孔派。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真理。鲁迅从辛亥革命时期起，一直是顺着历史潮流而前进的革命者，因此，毫不奇怪，在鲁迅的文章里，有许多痛斥尊孔、讽刺复辟的言论，从早年持续到晚年，从前期贯穿到后期。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谈到尊孔，又往往是和批判与揭露袁世凯之流的复辟倒退连在一起的。比如他说：“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从胡须说到牙齿》）又比如他说：“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里两次提到尊孔，也两次提到帝制，说明当时鲁迅亲身参加对袁世凯的斗争，目睹了倒行逆施的复辟阴谋，洞察到尊孔卫道的政治实质。袁世凯想做皇帝，才去奉祀孔老二。鲁迅的文章告诉我们：尊孔就是复辟。这不是文化思想问题，而是政治路线问题。

列宁在评论辛亥革命的时候指出：“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

已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匐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写于一九一二年的这段预言说得何等准确啊！正是这个野心家袁世凯，以阴谋手段攫取了总统的宝座，意犹未足，妄图用君主立宪的名义，复辟封建世袭王朝，买通其美国顾问古德诺，在《亚细亚报》上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诬蔑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低微，受专制统治的时间过长，对民主不感兴趣，仍以恢复帝制为宜。一些帝国主义使节群起附和，挟持袁世凯付出重大代价以换取对帝制的承认。一个说：“中国应当有一个皇帝”；一个说：“中国实行帝制，和我们同一国体，自然乐于赞助”；一个说：“改共和为帝制，是中国的内政，袁大总统可以放心做去。”袁世凯踌躇（踌躇 chóuchú，音仇除，自得的样子）满志，借此推动“舆论”，伪造民意，于是出现了“筹安会”，大肆吹捧孔老二，宣扬“春秋有尊王之义”。这样，在所谓“国体问题”的争论中，尊孔卫道也就成了复辟称帝的同义语。

毛主席指出：“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尊孔自然要先于复辟。对孔老二采取什么态度，便成为当时意识形态方面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一九一三

年，袁世凯派代表出席“孔子诞日纪念会”，并要教育部设计祭服，拟订仪式，在孔庙里预先演礼。鲁迅在九月二十八日的日记里写道：“星期，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哗然，人多声杂的样子）。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敏（敏koù，音扣）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鸷zhì，音致，凶狠）可畏也。……”（封二：3）寥寥百字，生动地画出一幕祀孔预演的丑剧，而鲁迅的憎恶心情，也已跃然纸上。到了第二年二月，袁世凯通令全国，“以夏时春秋两丁（夏时，阴历；丁，天干的第四位，可用来计时日，这里指阴历二月和八月上旬逢丁的日子）为祀孔之日”。鲁迅在三月二日的日记里记道：“晨往郢（郢yǐng，音影）中馆，要徐吉轩同至国子监，以孔教会中人举行丁祭也，其举止颇荒陋可悼叹。……”（封二：4）当年秋丁，袁世凯率领各部总长，文武官吏，穿上新制祭服，亲自到孔庙行礼。鲁迅却不予理睬，在日记里写道：“无事。”据他的朋友杨莘（莘shēn，音申）士回忆：当时鲁迅还和教育部五个同事，一起写信给教育总长，反对读经尊孔，并将信稿另抄一份，摊在桌上，引得部里职员竞来观看。他这样做，是对在尊孔问题上表现得“阴鸷可畏”的社会教育司司长——孔教会干事夏穗卿的回击。

正当尊孔的锣鼓打得十分紧密的时候，袁世凯拼凑请愿团，伪造劝进表，成立了大典筹备处，完成复辟的准备工作。但是，出于袁世凯意料之外，全国人民群起反对，各省纷纷宣告独立。这幕复辟的闹剧只演了八十三天，结果宣告破产。袁世凯想用孔老二作为复辟帝制的“敲门砖”，但是事实却如鲁迅所说：“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

不过事情并没有结束。

毛主席说：“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反对党八股》）袁世凯虽然死了，尊孔的“事业”却有人继承下来。当时，顽固地把这个当作宗教教条强迫人民信奉的，是鲁迅说的“永定为复辟的祖师”的孔教会会长康有为。康有为和袁世凯虽然都是孔门信徒，卫道“同志”，但复辟的具体内容不一样：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康有为玩弄的是“还政于清”的把戏。两个人同台表演，各唱各的。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康有为合张勋，密谋复辟。在这方面，他也是从制造舆论入手的。康有为把过去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一文里力主跪拜的反动主张，通过给北洋政府请求祀孔、实行跪拜的电文，再一次抛了出来，说什么“万国礼教无不跪，中国民不拜天，不奉耶、回（耶、回，指耶稣教和回教），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孔教十年大事》）在康有为的眼里，只要老百姓的膝盖着地，皇帝便能坐稳龙庭，而天下也就太平了。这是复辟必须尊孔的道理。

针对这种极端荒谬的主张，鲁迅辛辣地讽刺说：“康圣人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格物，这里指钻研物理）也。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研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其格物都比康圣人精到，后人之爱不忍释，实非无因。”（《忽然想到（一）》）指出了跪拜的没有根据，就使祀孔成为一个笑柄，而复辟的反动实质，也便在鲁迅的讽刺中暴露无遗了。

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鲁迅写的文章虽然不很多，但是他反尊孔、反复辟的态度表现得十分鲜明。除了上面所说以及帮助蔡元培推行“以美育代宗教”，坚决抵制奉孔教为国教外，至少还有两件事和反尊孔、反复辟有关。这两件事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紧贴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上，占去了鲁迅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一件是积极支持“尊法反儒”的章太炎，另一件是辛勤校勘“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集》。下面就分别谈谈这两件事。

二

鲁迅逝世的时候，马裕藻送了一副挽联：“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蔚（蔚dǎo，音到，大）汉阁；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鲁迅先生纪念集》）乐亭君指李大钊，因为他是河北乐亭县人，这里是说对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艰苦奋斗的高尚风格，鲁迅同李大钊深相契合。蔚汉阁指辛亥革命后反袁时期的章太炎。鲁迅认识章太炎很早，但过从较密，却都是在章太炎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鲁迅说：“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①，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②，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里说的都是辛亥革命以前的事情。一九一三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东城钱粮胡同，自名其居处为蔚汉阁。鲁迅和老友许寿裳又常常去探望他。往访的人寥寥可数，其中一个便是上述给鲁迅送挽联的马裕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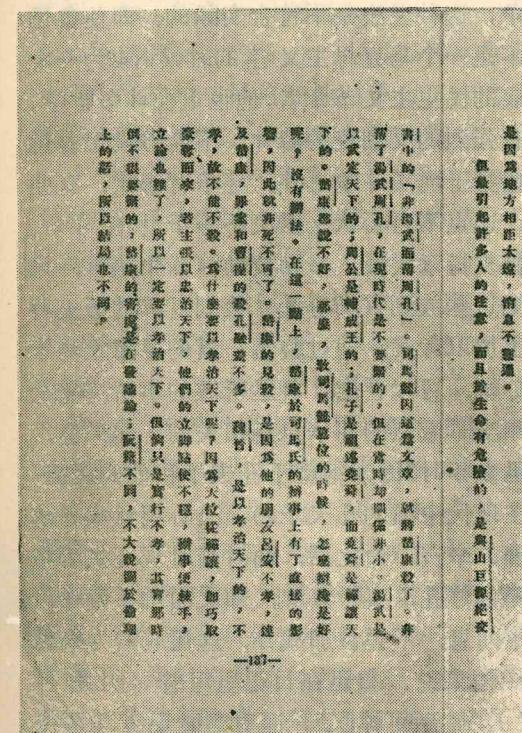
当章太炎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时候，他是尊法反儒的。为了驳斥康有为在《不忍》杂志（一九一三年）上发表的《中华救国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等文章，他在《雅言》等刊物上先后写了《秦献记》、《秦政记》，对康有为污蔑法家、吹

捧孔教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观点言论，不仅为鲁迅所佩服，而且以不同方式表现在鲁迅的许多杂文中。

一九一三年七月，黄兴发表讨袁电文，指尊孔复辟的主要人物袁世凯、赵秉钧、梁士诒、杨士琦为“四凶”。袁世凯侦知电文的属稿人是章太炎，八月间，将他诱至北京，软禁于共和党总部。在宪兵监视下，章太炎每天读书写字。第二年春天，他写信给袁世凯，要求前往青岛，袁世凯置之不复。他亲自到总统府讲理，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将接待室的桌椅、茶具、花瓶砸得粉碎。袁世凯设法将他改囚于龙泉寺。六月，章太炎决定绝食，许寿裳在传记里说：“其时弟子们环吁（吁xū，音须，叹息）床前，请进食，先生始尝梨一片。……当事恐先生饿死，复延医来省，于是得移至东城钱粮胡同。”（《革命元勋的章先生》）

鲁迅和章太炎过从较多有两回，前一回是一九〇八年在东京民报馆，那时是要推翻清廷，建造民国，革命派和保皇派斗争；后一回便是在北京东城钱粮胡同——也就是马裕藻挽联里说的蔚汉阁，这次是为反对尊孔，打击复辟，共和派和帝制派斗争。到了钱粮胡同以后，章太炎再一次绝食。景宋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里说：“当章先生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时，曾经被逮绝食，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推先生（指鲁迅）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这其实是在蔚汉阁的事情。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鲁迅日记云：“……午后，许季士来，同至钱粮胡同谒章师，朱遏（遏è，音替）先亦在，坐至旁晚归。雨。”以后又多次到过蔚汉阁。当时袁世凯筹备帝制，开始复辟，章太炎写了《魏武帝颂》、《宋武帝颂》等文章加以讽刺。他的《蔚汉微言》也作于这一时期，这是一篇谈话记录。短跋里说：“是

作于忧愤之中，口授弟子司法金事（金qīāh，音千；金事，旧官员名称）吴承士，令其笔述。虽多言玄理，亦有讽时之言。身在幽囚，不可直遂，以为览者自能知之也。”《微言》虽然不象《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建立孔教议》那样烛奸发隐，锋芒毕露，但肯定荀卿、韩非之说为“不可易”，宣传“世务日移，不可守古”的主张，始终如一。鲁迅后来对章太炎这段生活表扬备至，他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诟gòu，音够，辱骂）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挠屈者，并世也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封二：2）如果不是深知其人，身与其役，共同参加反尊孔、反复辟的斗争，很难讲得这样恳切和动人。



图一 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的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三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说：“自

民二（指1913年）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其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鲁迅对《嵇康集》校勘四次，抄写三遍，用力之勤，简直前无古人。他之所以这样做，正如小序所说：“亦第欲存留旧文，得稍流布焉尔。”（《嵇康集·序》）为什么要“存留旧文，得稍流布”呢？因为流布传播本身在当时就是一次战斗，是对上上下下叫嚣读经尊孔、复辟倒退的反动逆流的战斗，对袁世凯、康有为以及为他们出谋划策、阴险可畏的吹鼓手们的战斗！

鲁迅年轻时就喜欢魏晋文章。后来受到章太炎的影响，以为魏晋文章确实像章太炎所说的那样，“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①（《国故论衡·论武》），是写议论文的好方式。不仅如此，而且在内容上，也较有特点，因为“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这点出发，他非常推崇曹操、嵇康、阮籍等人，他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他举《难自然好学论》和《管蔡论》两文为例。《难自然好学论》虽然是驳张邈《自然好学论》的，却和孔老二直接对立。嵇康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做事而有饭吃，那就闲逛而不喜欢读书了，好学只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这就搞乱了“孔家店”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天下。魏晋之间的人相信孔子曾诛少正卯，大都认为少正卯是坏蛋，就象周公诛管、蔡的故事，而管、蔡原是该杀的坏蛋一样。嵇康却说管叔、蔡叔是好人，他们的被杀是冤枉的。这不也就针对孔老二，挖掉儒家的老底，使他们感到办事棘手了吗？

鲁迅进一步谈到嵇康说：“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

① 原文如此。前面引号内的××疑为“献策”两字，后面的×××指吴稚晖。

② 原文如此。×××指蓝公武。

① 孚尹旁达：语出《礼记》，原意是说玉的色彩光亮。这里引伸出的意思是说文章观点鲜明，毫不晦涩。

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应为司马昭）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司马昭）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图一）这样，嵇康就非死不可了。司马昭终于借“不孝”之名杀了他。

鲁迅的校勘《嵇康集》，可以说是他反尊孔、反复辟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试查鲁迅日记，一九一三年九月，他一直在写“台州丛书”本的《石屏集》（《石屏集》，宋代戴复古著的诗集）。当时袁世凯为窃国制造舆论，要教育部议具祀孔仪式。鲁迅目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便想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二十三日，曾经到琉璃厂“搜《嵇中散集》①不得”。九月二十八日，在一片“帝制”“尊孔”声中，第一次看到祀孔的把戏，鲁迅觉得发动者“阴鸷可畏”，校印《嵇康集》的心愈切。第三天，即十月一日，便有这样的记载：“午后往图书馆寻王佐昌，还《易林》，借《嵇康集》一册，是明吴匏（匏pao，音袍）庵从书堂写本。……夜抄《石屏集》卷第三毕，计二十叶。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在忧患中，可哀也。”这段短短记载，反映出鲁迅此时此地的心境。同月十五日日记云：“……夜以从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以后几天大概就开始校抄了，这于十九日日记“夜续校《嵇康集》”一语可见。二十日日记记着：“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续写《石屏集》第六卷。”可见他校《嵇康集》插在影写《石屏集》中间，急于做完。短跋里也说：“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他当时很想就这样将它出版，为什么呢？为了战斗。

鲁迅校勘《嵇康集》，不是孤立地校一部书，做一点研究工作，而是清醒地看出袁世凯

要当篡位的司马昭，借读经尊孔制造舆论，一切革命人民都和自己一样：“无日不在忧患中”。当时袁世凯正在通过御用机构，“通电各省，征集多数国民祀孔意见”，鲁迅打算出版这部“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集》，正是作为对袁世凯“征集祀孔意见”的一分答案，一种嘲弄，一次沉重的打击。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列宁教导我们不要把事情悬空起来、割裂开来，孤立地和游离地加以分析。对于鲁迅的许多活动，也必须这样理解。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工作性质的限制，鲁迅的活动范围较小，但倘以为他只是躲在会馆里校古书，抄古碑，没有积极参加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即使鲁迅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作为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他也重视斗争哲学，具有强烈的反潮流的精神，不能够设想鲁迅会置身于现实斗争之外。斗争有起伏，有曲折，这点不可否认，但决不等于没有斗争。积极支持章太炎、辛勤校勘《嵇康集》，只要把这些放到宣扬尊孔、策划复辟的历史背景上加以考察，通过鲁迅一贯的思想立场予以分析，可以看出：鲁迅所做的事情，完全是和当时激烈的斗争息息相关的。如果说，鲁迅少年时“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决心到日本寻求真理，辛亥革命之后，面对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提倡尊孔，实行复辟，却反而袖手旁观，默尔而息，不去参加战斗，这还成其为鲁迅吗？如果说，鲁迅在日记里写着“阴鸷可畏”，“荒陋可悼叹”，面对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主张读经，公然倒退，却反而埋头读书，潜心学术，不去参加战斗，这还成其为鲁迅

（下转 24 页）

① 嵇康曾经在魏国任中散大夫官职，世称他嵇中散。《嵇中散集》就是《嵇康集》。

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

——谈鲁迅为《阿Q正传》日译本所写的校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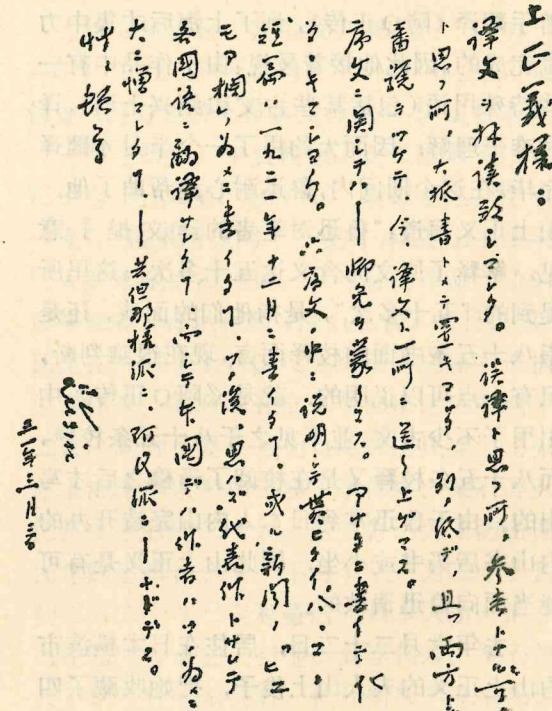
戈宝权

去年六月下旬，在日本发现了鲁迅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写给《阿Q正传》日译者山上正义的信和为日译本所写的八十五条校释（图二——四）。鲁迅的这一珍贵文物在四十四年后的发现，引起了中日两国文化界和友好人士的极大的兴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鲁迅的新的重要史料。通过对这一难得的史料的研究，可以了解到，鲁迅远在三十年代初，为了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文化交流所作的巨大的努力；也可以看到鲁迅的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和他对革命工作的那种始终一贯的严肃、认真和负责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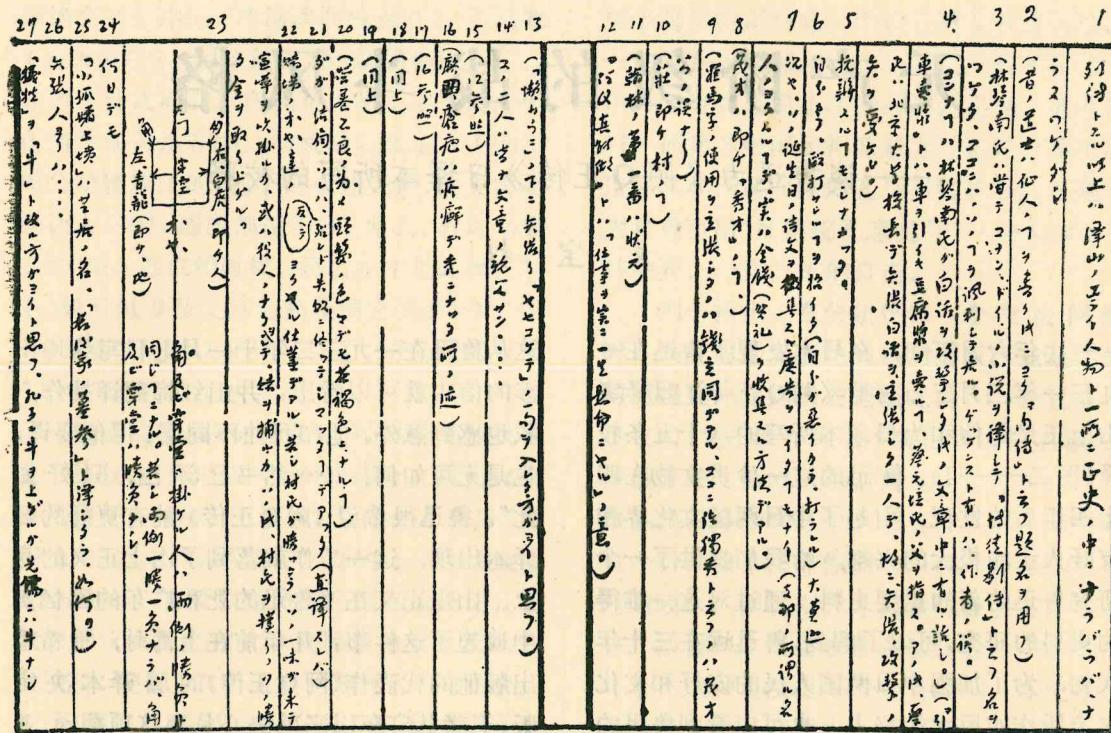
《阿Q正传》的日译者山上正义（1896—1938），笔名林守仁，是位日本的革命作家和新闻记者，也是位诗人和剧作家。远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他就作为日本新闻联合通信社的特派记者到了正处于革命高潮的广州。鲁迅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到了广州，二月间他们两人相识，从此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从广州回到上海，接着山上正义在目睹了广州公社的英勇起义之后，也于一九二九年以新闻联合通信社上海分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了上海，继续和鲁迅交往。我们现在从他在一九二八年为《新潮》杂志三月号写的《谈鲁迅》和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后为《改造》杂志十二月号写的《鲁迅的死和广东的回忆》等文中，都可以看出他们交往的情形。

山上正义准备翻译《阿Q正传》，还是在广州时期的事。虽然《阿Q正传》早已有了井山红梅的日译本，但是鲁迅是不满意的。

这从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写给增田涉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井山红梅翻译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并不同道。但他要译，也是无可如何。……然书已译出，只好如此”。鲁迅很希望《阿Q正传》能有更好的日译本出现，这一工作就落到了山上正义的身上。山上正义在《鲁迅的死和广东的回忆》中谈起了这件事：“几年前在上海时，他希望出版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的日译本决定版，笔者从广东以来就决心从事这项翻译，并当在广东时就在日本的《新潮》杂志上发表了这个决心，两方面的愿望不谋而合，于是笔者



图一 鲁迅给山上正义的信



图二 鲁迅为《阿Q正传》日译本所写的校释（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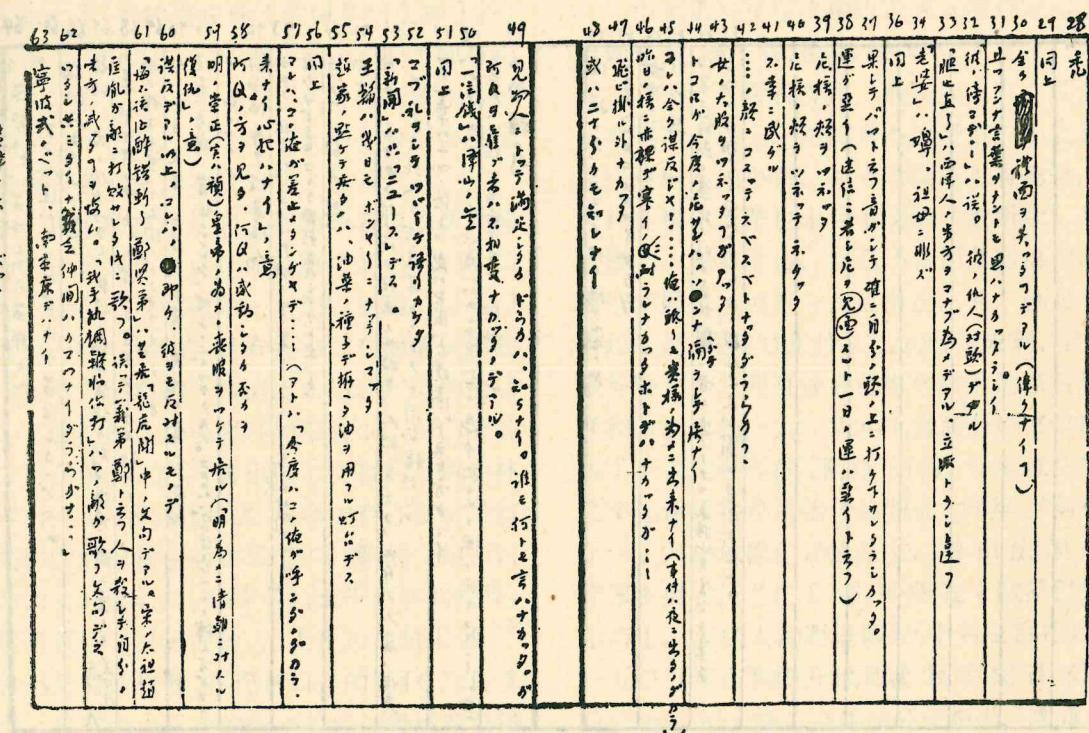
就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在上海完成了这项翻译工作”。看来，山上正义在广州时已开始着手翻译《阿Q正传》，到了上海后才集中力量完成的。因此他接着又说：由于作品中有一些特殊用语（包括某些古文和绍兴土语），译时难于理解，因而大约用了一个半月才翻译完毕。在这个期间内，鲁迅耐心地帮助了他。山上正义写道：“鲁迅对笔者的译文提了意见，解释了原文的含义达五十多次”。这里所提到的“五十多次”，是指他们的面谈，还是指八十五条书面的校释而言，现在很难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说明的，就是《阿Q正传》中引用了不少古文，并不见之于八十五条校释，而八十五条校释又是在校阅了译稿之后才写出的。由于鲁迅常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办的内山书店买书或小坐，因此山上正义是有可能当面向鲁迅请教的。

去年六月二十二日，居住在日本横滨市的山上正义的夫人山上俊子，把她收藏了四十四年之久的鲁迅写给山上正义的信和为

《阿Q正传》日译本写的八十五条校释的原件拿了出来，让我们有可能见到这一珍贵的文物，难怪日本的报纸在新闻的大标题中称它是“幻のメモ”，意译即“引人遐想的书简”了。

鲁迅的信是用毛笔写在大张的白色信纸上，上款是“山上正义様（先生）”，正文的日本字母全用片假名（正楷），笔迹清楚工整，下用德语拼音署名，注明“三一年三月三日”。（图一）八十五条校释是写在三大张印有红色直格的稿纸上，稿纸中央有折缝，每张分为两面，每面十行，这和鲁迅常用的稿纸很相似，因此对于见过或熟悉鲁迅的书简和手稿的人，感到特别亲切。

山上正义译的《阿Q正传》，由日本东京四六书院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五日出版发行，到现在也已经快四十五年了。听说在日本这个译本已经成为难得的和几乎找不到的书，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译本是经过鲁迅校阅的。但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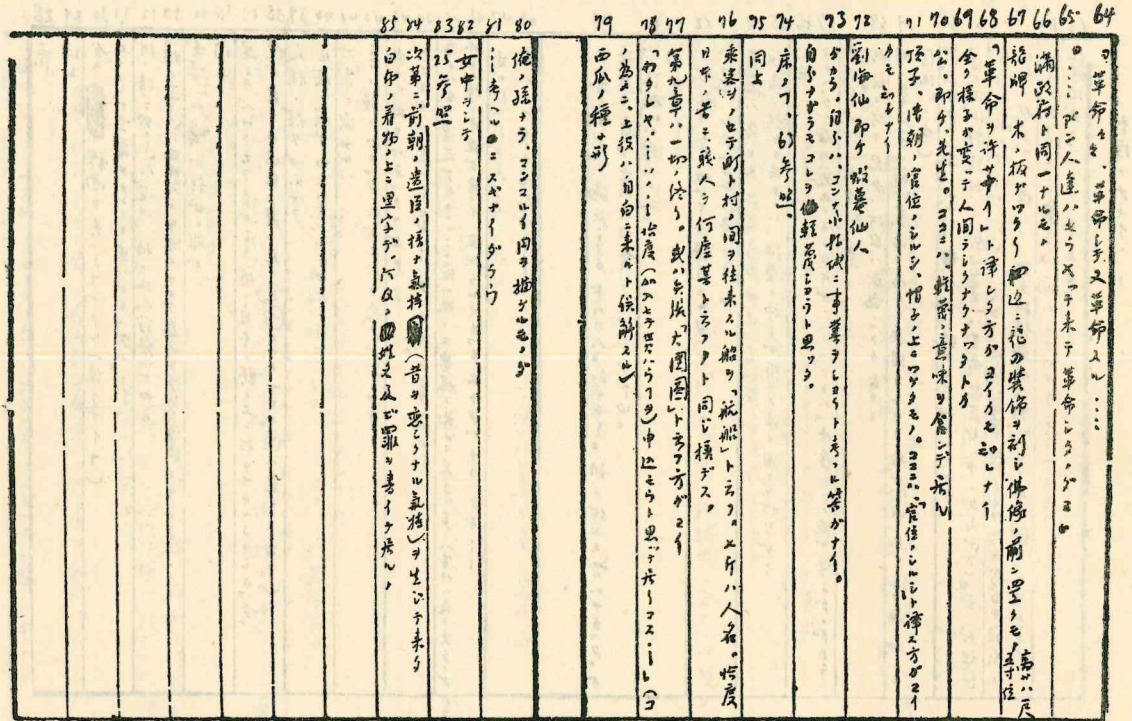
图三 鲁迅为《阿Q正传》日译本所写的校释（之二）

藏有此书，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根据这个译本来进行一些探索。这个译本的封面上印着《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的黑体美术字，左下角画着两个用黑红色套印的工人的形象，其中一个工人右手拿着铁锤，高举左臂作召唤状（封二:5）。书脊顶端用小字印着“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下面是书名和“鲁迅著·林守仁译”的字样。从外表看起来，这是一本鲁迅的《阿Q正传》，但仔细翻阅一下全书的内容，这又是日本的革命文艺界人士，为了纪念我国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五位革命烈士而编印的一本具有强烈的政治理性的文集。书前印有李伟森等人的遗象和悼念他们的献词，正文在《阿Q正传》之后译载了胡也频、柔石、冯铿等人的作品和小传。《阿Q正传》占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日本革命作家尾崎秀实（笔名白川次郎）还在当年五月二十三日为此书写了《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的长篇序文，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和革命战士

的血腥罪行，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和革命文艺运动作了有力的支持。

从《鲁迅日记》中我们知道：“（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晴。……得山上正义信并《阿Q正传》日本文译稿一本”。接着是

“三月三日雨。午后校山上正义所译《阿Q正传》讫（讫qī，音气，完），即以还之，并附一笺”。这里所说的“一笺”，就是山上正义夫人所珍藏的那封信。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形势来看，鲁迅接到《阿Q正传》的日译稿，正是在一月十七日国民党反动当局秘密逮捕了李伟森、柔石等五位革命作家之后的四十二天，同时又是二月七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龙华杀害和活埋了李伟森、柔石等五位烈士之后的二十天。这时鲁迅为了防备国民党的追缉和逮捕，不得不从一月二十日直到二月二十八日全家避居到日本人所开的旅馆花园庄公寓去。当他听到李伟森、柔石等人不幸牺牲的噩耗时，他怀着极其悲痛和愤怒的心情，写出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



图四 鲁迅为《阿Q正传》日译本所写的校释(之三)

刀丛觅小诗”的诗句(封二：1)，对遇难的烈士寄托了深切的哀思，对国民党反动当局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同时也表达出了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和坚贞不屈的战斗意志。也就正是在国民党进行残酷的文化“围剿”的时候，鲁迅校阅了山上正义的《阿Q正传》的译稿。从日记中看，鲁迅在接到译稿的前后几天，差不多都去过内山书店，虽然日记上并没有任何其它记载，但很有可能同山上正义见过面。鲁迅在不到四、五天的时间之内，主要是在三月三日的下午校完了译稿，并细致地写了八十五条校释。我们应该认识到，鲁迅在当时的情形下认真校阅译稿，决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作品能有一个较好的日译本，而且还是为了支援纪念五烈士的文集能在日本早日出版。这是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作的重要的贡献！

鲁迅对《阿Q正传》日译本的校阅工作，是非常认真、细致而又负责的。尾崎秀实在序文中称鲁迅是位“声名卓著的作家”，是中

国革命文学的“泰斗”，并说“这部译稿的原文，曾经过原作者鲁迅的严密的校阅”。鲁迅在写给山上正义的信中也说：“译文已拜读。我认为误译之处，或可供参考之处，大体上均已记于另纸，并分别标出号码，今随译文一并寄上”(图一)。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可能见到山上正义的译稿，因为文稿和译稿在排印之后一般很少被保留下来。但我们从鲁迅写的八十五条校释来推测，大概鲁迅先在原译稿上标出了号码，这样好让译者同写在另纸上的校释对照着看。现在粗看八十五条校释，似有无头无尾之感，其实查对一下山上正义的《阿Q正传》日译本，就可以发现，鲁迅写的八十五条校释，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译文提的意见(未加括弧)，如第1、5、6、7等条，这是建议日文应如何译法为好；一类是对译文中的出典或文字作解释的(加括弧)，如第2、3、4等条，但后来也有不少条未加括弧。山上正义对鲁迅所提的这八十五条校释，基本上都采用了，有的已改

在译文上，有的是在译文的每章后面加了注，或在正文中加了夹注。日译本的《阿Q正传》，现共有二十条注，其中有八条和鲁迅写的注释相同，其他十二条则是根据鲁迅提出的有关意见由译者自加的。

鲁迅的校释是为了帮助译者校改译文和为了让日本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而加的。现在不可能逐条一一加以说明。但可以指出，其中主要的，是有关中国在晚清民初和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些情况和“五四”运动前后的文言与白话之争的(如第8、11、14、67等条)。在第3、4条中，鲁迅则对文言的卫道者林琴南进行了讽刺。其次，注释中有许多条是有关中国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如第7、23、25、38、55、61、76等条)。至于更多的校释，则是属于字义方面的。山上正义尽量采用了鲁迅所写的校释。在现有日译的《阿Q正传》中，只有山上正义的译本是经过鲁迅亲自细心校阅的，一九三七年日本改造社出版的《大鲁迅全集》中采用的也是山上正义的译文。

鲁迅在写给山上正义的信中说：“关于序文——恕不能如命，请你自行撰写”。山上正义因此在译文前写了一篇《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的文字，其中给了鲁迅以高度的评价，称他是“自从民国革命二十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的唯一代表者。就他在文坛上的位置来说，到今天依然是现代文坛的泰斗”。接着他谈到鲁迅思想的转变和《阿Q正传》这部作品，称它是“鲁迅几十篇作品中的代表作”，是“当今文坛上的一部名著(Classic)”。他期望鲁迅或是其他革命家能写出新时代的第二部《阿Q正传》：“这第二部《阿Q正传》也不一定要鲁迅自己来写吧。不论它由谁来写，这第二部《阿Q正传》，其正传不是阿Q的蒙昧史，也不是阿Q的失败史，而正应该是阿Q的觉醒史，真正的革命的成功史，这一点是确信不疑的。因此，相信它的最后一章不会是《他的结局》，而应是《新生活的起点》。”

山上正义在序文中也谈到《阿Q正传》已译成英、德、法、俄和世界语等文字，并说俄文已有两种译本，最新版上有卢那察尔斯基写的序文，对此书甚为赞赏。山上正义在这里不无小错，如当时尚未见有德译，又卢那察尔斯基也未为俄文的“最新版”写过序文，想系讹传。鲁迅还曾因此写信询问曹靖华同志。但有一点值得提出的，就是在鲁迅生前，《阿Q正传》已先后译成英、法、俄等种文字，而且译者都得到鲁迅的亲自解释和帮助。如一九二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社乾英译的《阿Q正传》，译者就在序文中感谢了鲁迅所给予的帮助。同年，《阿Q正传》又由敬隐渔译成法文，曾由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介绍刊登在《欧罗巴》杂志上。苏联人瓦西里耶夫(中名王希礼)从一九二五年在我国开封时就着手翻译《阿Q正传》，于一九二九年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鲁迅专为这个译本写了自传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据曹靖华同志回忆，鲁迅当时为译者解答了不少疑难之处，还就赌博问题绘了一张图，类似在为山上正义写的校释第23条的那张图。可惜这些珍贵史料的原件都早已不存。鲁迅是精通日语的，他能对日译本亲自做了“严密的校阅”，因此今天发现的这一革命文物就显得更为珍贵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主席又说：在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进攻的新军中，鲁迅是“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这都是对鲁迅所作的极高的评价。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在反动的白色恐怖和血腥的镇压、迫害之下，不畏强暴，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甚至在一九三一年二、三月最艰难的条件下，还为山上

(下转17页)

友谊的选择

——读鲁迅给山上正义的信

唐弢

读了鲁迅给山上正义的信，以及他为《阿Q正传》日译本所写的八十五条校释（图见前篇），一个伟大坚强的旗手、英勇战斗的革命前辈的形像，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鲁迅在谈到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据我看，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说着‘亲善’呀，‘提携’呀，到得明年，也不知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这“现在”，指的是一九三五年初，日本法西斯军阀驱兵深入我国华北平原，而受其支配的外交首脑，却在第六十七届议会上，发表了“日支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鲁迅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正是对演说的答复。他将这段话写入为内山完造文集而作的序言里，并且预言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颇曾感动了当时一部分日本朋友。他们也和中国人民一样，热爱自己的民族，怀有强烈的反法西斯的愿望和感情。

我现在想起这些，因为觉得这段话也适用于山上正义。不错，鲁迅为山上写校释是一九三一年二、三月间的事情，他们的交往，还可以追溯（溯sù，音诉，追求根源）到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时候。那时尚未发生“九·一八”事变，法西斯军国主义也还没有在日本国内得势。但是，就在山上亲身经历的一九二七年广州公社的日子里，游弋于沙面附近的日本军舰，曾经炮击过广州的起义队伍——工人赤卫队和叶挺率领的士兵。侵略者的

扩张主义野心并不是某一个早上突然形成的，它早已存在，而且不断地发展着了。一切进步势力必须警惕和斗争，道理也正在这里。

难得的是：山上却以满腔热情注视着中国革命。在那浴血的日子里，就象约翰·里德以《震撼世界的十天》歌颂俄国革命一样，他也根据目睹和身经的事实，为中国革命写下了剧本《震撼中国的三天》，表示他对仅仅存在过三天的工农民主政权——广州公社的向往。不仅如此。当鲁迅还没有离开广州的时候，山上已经报道了从一九二六年底至一九二七年初中国革命的生气蓬勃的景象：游行、集会、宣讲，武装斗争和文化斗争。他用激动的心情介绍了充满希望的生活，在同鲁迅谈话中间，也情不自禁地流露了出来。鲁迅理解山上，山上当时还不十分理解鲁迅。反革命阴谋在暗室里悄悄地进行。山上看不到躲在希望背后的“失败”，看不到压在高兴底下的“呻吟”，因此鲁迅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某些含有科学预见的谈话，在山上听来，同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情景相比，反倒是有点“近于冷漠、阴暗和失望”（《谈鲁迅》，一九二八年《新潮》三月号）了。

问题不在于对个人的理解，而在于对革命和人类进步的强烈的共同愿望。鲁迅是这样看待山上的。他在这方面有过足够的经验。从早年留学日本到晚年定居上海，鲁迅斥责过日本资产阶级政客对革命的别有用心的诽谤，嘲讽过以“支那通”自居、其实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所谓学者的歪曲，却以更多的时间和热情，接待了大批对中国革命前途怀着善意

和期待的日本青年。山上正义是这些日本青年中的一个。

一九二六年十月，山上以日本“新闻联合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到达广州，访问了不少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人物。大概因为自己也在从事文学工作的缘故吧，不久就写了《南方中国的文学者之群》，发表于一九二七年《新潮》二月号上。他从文化现象反映革命气氛，说明社会主义书刊在群众中的影响，比较敏锐地抓住了大革命的政治实质。山上初次出现于鲁迅日记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一日，即鲁迅到达广州后的第二十四天。日记里记着：“十一日，昙（昙tāo，音谈，多云）。……下午，山上政义来。……”再次出现于五月六日：“六日，昙。……午，山上政义来。……”他们大概还在别的场合如创造社门市部等处见过面，因此山上有更多的机缘接近鲁迅，漫谈革命形势和文学现状，给鲁迅留下较好的印象，初步取得了翻译《阿Q正传》的允诺。

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材料，山上先后写过四篇介绍鲁迅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他在《改造》十二月号发表了《鲁迅的死和广东的回忆》，其中谈到一九二七年初次见面的经过，文章描述了一通鲁迅在中山大学简单朴素的生活之后，接着写道：“鲁迅说是久未吃到日本饽饽了，我便带他走出房间，回到英法租界沙面来，从日本人的店里买了，在珠江畔的一棵老榕树荫里，一面吃着，一面听鲁迅的中国文学论和中国革命论。”这一节写得十分动人。广州的榕树往往披挂着可以遮住几亩乃至几十亩田地的枝叶：老榦虬（虬qiú，音求，传说中的一种龙）盘，绿荫如盖。从远处望去，简直是一幅美丽的画图。不过谈话的内容是严峻的。山上在一九二八年写的《谈鲁迅》里已经作了追述。鲁迅的“中国革命论”是：“广州的学生和青年，都把革命游戏化了，过于安易化了，使人感受不到真挚和严肃。倒是经常处在压迫和摧残之中的北方学生和青年那里，反而可以看到严肃认真的

态度。”革命是严肃的，同时也是艰巨的，这确是鲁迅的思想和主张。他稍后说的“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必然混有污秽和血，……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正是这一思想的辩证的发展。至于“中国文学论”则是：“在广州，尽管有绝叫，有怒吼，但是没有思索；尽管有喜悦，有兴奋，但是没有悲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不会有文学。”

如同别的文章里说过的一样，鲁迅在这里谈的其实是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应当是革命经验的历史总结，因此在绝叫和怒吼里要善于思索，在欢乐和兴奋里要想到挫折，不能把革命“游戏化了”，“安易化了”。这也正如他说过的，“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文学是为革命服务的。在说着这样的话的时候，很明显，鲁迅想的主要是革命，他大概已经有了广州“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三闲集·在钟楼上》）的预感。不久，广东新军阀果然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逮捕和杀戮了二千一百多人，其中有四十多个是中山大学的学生。鲁迅营救无效，愤而退回聘



图一 鲁迅在广州时居住过的白云楼

书，辞去一切职务，蛰居白云楼寓所（图一）。这在山上的文章里，也有色彩鲜明、感情强烈的记述：

“在鲁迅潜伏的一家民房的二楼上同他对坐着，我找不出安慰的言语。刚好有一群工人纠察队举着工会旗和纠察队旗，吹着号从窗子里望得见的大路上走过去。

“靠窗外的电杆上贴着很多‘清党’的标语，如‘打倒武汉政府’、‘拥护南京政府’、‘国贼中国共产党’等等。在这下面，甚至还残存着由于没有彻底剥光，几天前大张旗鼓地张贴的‘联共容共是总理之遗嘱’、‘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完全相反的标语。”

“鲁迅望着走过的工会纠察队说：‘真是无耻！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去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给他这么一说，我发现那倒确是一些右派工会的工人，充当公安局走狗，在干着搜索左派工人的勾当。”（《谈鲁迅》）

鲁迅痛恶叛徒，痛恶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四月十五日那天，广东新军阀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向赤色工会派出改组委员，分裂工人运动，拉拢投机分子。鲁迅和山上见到的手举工会旗、吹着号子走去的纠察队，就是经过改组的纠察队中的变节分子，他们充当猎狗，正由主子派人牵着，去搜索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对于这种“血的买卖”，鲁迅悲愤填膺，鄙夷地斥之为“无耻”！

感谢山上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报道。“血的买卖”并没有使革命工人屈服。“四·一五”大屠杀后，广州工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分做六区，继续战斗。六月十九日省港罢工两周年大会，二十三日沙基惨案纪念游行，十月十四日海员大罢工，都是从血泊中重新抬起身来的规模宏大的斗争。正是在这胜利与失败相交织、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野草·题辞》），鲁迅才有可能运用多种文字形式，不断地向蒋介石、向公开提出

“清党”建议的反动政客吴稚晖开火，山上才有可能继续向革命力量采访消息，写出包括鲁迅在内的可歌可泣的事实报道。然而鲁迅毕竟不同于山上。他对革命形势完全清醒，因此也分外痛苦。时时觉得“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小约翰·引言》）写于当时的这段感觉，现在看来，的确比所有事实记载更沉痛，更深刻，更真实，同时也更有节奏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起源于广州、完成于上海的《阿Q正传》的日译，鲁迅同意由山上正义承担，这既因为山上对中国革命和人类进步表示过深切的关怀，引起了鲁迅的好感；还由于在广州、上海的两地，山上和鲁迅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由广州抵达上海，大约一年另几个月之后，亲身经历了广州公社的山上也接踵而来。山上的姓名出现于在上海时期的鲁迅日记，先后有五次。实际上他们的过往却不止此。他们的会面大部分是在内山书店里，参加为大家所熟知的漫谈会之类。

鲁迅来到上海之后，不久就从革命互济会（又称中国济难会）那里，听到了更多关于“血的买卖”的事实。以周恩来同志为主要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英勇斗争，使帝国主义惊惶失措，他们从当时的北伐军中找到了代理人流寇蒋介石，发动他原先的流寇弟兄杜月笙等，组织“中华共进会”，拉拢工人运动中的动摇分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正是由这些工贼充当眼线，以十元银洋一个人头的代价，捕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鲁迅回想到广州白云楼上目击的情景，当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于一九二九年论功行赏，大小工贼，文武流寇，一律封官进爵的时候，他以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投降派为例，痛斥工人运动和革命营垒中的变节分子，指出他们终于是跪在敌人脚下的万劫不复的奴才。

其时山上已经到了上海。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大概还是“找不出安慰的言语”吧。至于终于译完在广州时发愿介绍的《阿Q正传》，却是一九三一年初蒋介石再一次大屠杀时候的事情。这个流氓勾结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买通工贼告密，逮捕了包括五名左翼作家在内的二十三个共产党人，其中就有林育南、何孟雄等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统统被枪杀或活埋于上海附近的龙华。山上便在鲁迅同意下，和另一个也与鲁迅相识的日本友人尾崎秀实合作，利用译本可以避免国民党政权的干涉与检查，以书名《阿Q正传》为掩护，向全世界揭露了黑暗中国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译本除了小说《阿Q正传》外，还约人共同翻译，选刊了死难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的作品、小传和照象，并由尾崎化名白川次郎，写了题为《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的长序，详细地介绍了在白色恐怖下反文化“围剿”的斗争，指出鲁迅在战斗的左翼运动中的作用：“如所周知，他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领袖，至今还在勇敢地战斗。”

这也是山上急于在那个时候译完《阿Q正传》的原因：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正因为这样，山上自己也在小说前面写了《鲁迅及其作品》一文，进一步说明了小说《阿Q正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意义：

“这部小说是十年前创作的。鲁迅恐怕是观察了二十年前辛亥革命及其失败的过程，从而写出了这个作品。因此，在辛亥革

命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之后，对于了解目前正在发展到统一全中国的三民主义革命的实质的人来说，一定会看到，早在十年之前，鲁迅已经觉察到会有今天，事前就深刻地描写了今天所谓三民主义革命的罪孽、失败及其真实的含义。”

山上认为：《阿Q正传》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由于作者鲁迅深刻的观察和描写，小说客观上也揭示了后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所谓三民主义革命的本质——压迫、欺骗、杀戮的反动的本质。这个分析是正确的。无论对于《阿Q正传》本身还是当时之所以出版这个译本，这个分析都是正确的；它写出了鲁迅想讲和要讲的话。

从广州到上海，很显然，山上是愈来愈理解鲁迅、契（契qì，音气，情意相投）知鲁迅了。这不仅因为他们之间的交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山上从自己的遭遇出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鲁迅为中国革命和人类进步的献身精神，因而服从革命的需要赶译了《阿Q正传》。反过来，这也正是鲁迅对山上的友谊的选择。鲁迅说过：“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而他们终于互相了解，并且找到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人觉得在他们的交往中，好象时时跳动着一种掩盖不住的精神光采，从而为之衷心感动的吧。

一九七六年三月改于上方山×××医院

（上接13页）

正义校阅了《阿Q正传》的全部译文，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知道，鲁迅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对人还是对事，无论对自己的创作和翻译，还是审阅别人的创作和翻译，甚至直到编辑、排印和看校样等工作，无不采取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鲁迅的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

风，也正是由他对于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所决定的。

当鲁迅写给山上正义的信和为《阿Q正传》日译本写的八十五条校释珍贵文物在我国初次发表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毛主席的话：“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共产党嫌疑被捕

趙推事詢問郭英、郭身穿鐵鏈、外加短呢大衣、目近視、稍較常人突出、其是否加入共黨、搖頭發平靜之冷語、推事詢問以汝為其黨書記、不黨、我不知道、一問以汝為其黨書記、告席中、無半點憂色、總之、為一冷酷、答稱、「不知道」、語更冷漠、站立被叛徒出賣，不幸在帝国主义租界里被捕。

图二 国民党报纸报道郭纲琳被审时的情况

“何罪之有”？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组成的特别法庭上，一场尖锐的斗争开始了。郭纲琳从容镇定地挺身站着。她用威严的目光向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和伪法官扫了一下，又看了看座无虚席的听众和中外记者，觉得这里倒是个极好的讲台，决心变法庭为战场，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和罪行。

审讯开始了。当法官指责郭纲琳犯了“危害民国”、“破坏睦邻”罪的时候，郭纲琳冷笑了一声，厉声质问：“谁丢了东北三千万同胞，谁丧失了东北四省，谁便是危害了民国！你们说，是我，还是你们国民党？谁侵略了邻国的领土，谁强占了邻国的财产，谁奸淫了邻国的妇女，谁就是破坏睦邻！你们说，是谁？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义务和权利。你们说，何罪之有？”

郭纲琳一字字、一句句铿锵有力的反责问，使旁听席上的群众听出了神，而伪法官却被弄得手足无措，只得故作镇定地说：

“你这样年轻，中毒实在太深，要好好悔改。”

郭纲琳马上驳斥：“谁丧权辱国，谁就应该悔改；谁卖国求荣，谁就是罪大恶极！”

国民党卖国代表和帝国主义走狗法官被驳得张口结舌，不得不宣布暂时停审。

第二天，一家外国报纸这样报道：

“郭英这位年轻的女孩子的眼睛里，有一种威严不可侵犯的光芒。那种光芒射着法官，法官失色；射着国民党那位可怜的代表，那位代表低头。结果弄得不是法庭在审讯犯

放，为整个被压迫人民的翻身解放，为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终实现，而英勇斗争。

在沸腾的斗争生活里，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一九三四年春天，郭纲琳在积极组织上海闸北区丝厂工人同盟罢工的时候，被叛徒出卖，不幸在帝国主义租界里被捕。

《雁之歌》

不久，郭纲琳被引渡给国民党反动政府，解到了南京。敌人不甘心法庭上的失败，对郭纲琳极力施加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然而，无论是严刑还是利诱，都动摇不了共产党员郭纲琳的坚定立场。她向狱中的难友说：

“我们是革命战士，要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党性的纯洁。我们可以抛弃一切，决不能失去这个比生命更伟大的政治贞操！敌人可以枪杀我们的肉体，但决不能枪杀我们的灵魂！”

郭纲琳拿出一个枕套，在中间绣出了一行刚劲有力的英文“*To struggle for truth*”（“为真理而斗争”）（封三：6），用来激励自己，激励狱中的同志。

有一次，郭纲琳望着监狱铁窗外天空中的雁群，深有感触地对难友们说：“雁是很高尚的鸟，它们是合群的，它们也是最有组织和守纪律的。”

有一个难友说：“可惜我们现在成了失群

为真理而斗争的勇士

——记革命烈士郭纲琳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史料陈列室

这里，我们介绍一个革命烈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反映她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的几件十分珍贵的文物。烈士名叫郭纲琳，又名郭英，江苏句容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二年任上海沪西区区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任共青团无锡县委书记。一九三四年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一九三七年七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这里有一张烈士在敌人监狱里的照片（图一）。面对着凶恶的敌人，烈士坚毅严峻的眼光，逼得敌人不敢仰视；烈士镇定肃穆的神色，吓得敌人噤若寒蝉。

这里还有烈士在狱中绣制的一幅手绢（封三：8）。在手绢的左上角，绣出一颗五角星；右下角绣出一颗拥着花枝的红心，红心里又绣出两行英文“*Long live*”（“万岁”）。当时红军正在长征路上。显然，烈士通过精心刺绣倾注在手绢上的，正是对毛主席、对党、对红军的一片赤诚和衷心祝愿。

对敌人，立场坚定，英勇斗争；对党、对同志，满腔热情。这种阶级爱憎是多么分明，多么强烈啊！这正是烈士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了无产阶级战士高贵的政治品质。

“我再也耐不住读死书了”

郭纲琳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勒令退学。一九二九年，到上海中国公学高中部读书。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



图一 郭纲琳烈士在狱中的照片

一八”事变，妄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反动卖国集团，仍然在推行“绝对不抵抗”的投降政策。而中国共产党则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武装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国土上彻底驱逐出去的伟大号召。党的召唤给二十二岁的郭纲琳指明了斗争方向。当时，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在给家里人的信中说：“我再也耐不住读死书了！”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有志气的革命青年，怎能关起门来啃那些脱离实际斗争的死书呢？郭纲琳决心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经受革命的锻炼，立即参加了救亡斗争的行列，奔走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组织“抗日救国会”，很快成为一个受到大家爱戴的领导人。不久，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把自己年轻的生命和党的事业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

的孤雁了。”

郭纲琳说：“我们并不是孤雁！成千成万的中国人民在希望着我们，我们的党和同志们在继续战斗。我们并不是孤雁！越来越孤单的是想用监狱的铁栏将我们和群众隔开的那些卖国贼、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服务的清道夫——国民党！”

不久，郭纲琳写出了《雁之歌》，用来勉励自己和鼓舞难友们的斗志。她又在自己的枕套上描了一只雁和“起来”两个字，然后一针一线精心地绣起来。牢房的难友们围坐在她身边，眼看着一只凌空翱翔、俊秀丰满的大雁逐渐在枕套上出现；接着赫然入目的是两个大字——“起来”！（封三：5）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庄严的《国际歌》声一遍又一遍地响彻牢房。难友们热血沸腾，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倍增。同志们的心连得更紧了。他们象雁群那样地团结，象雁群那样地有组织和守纪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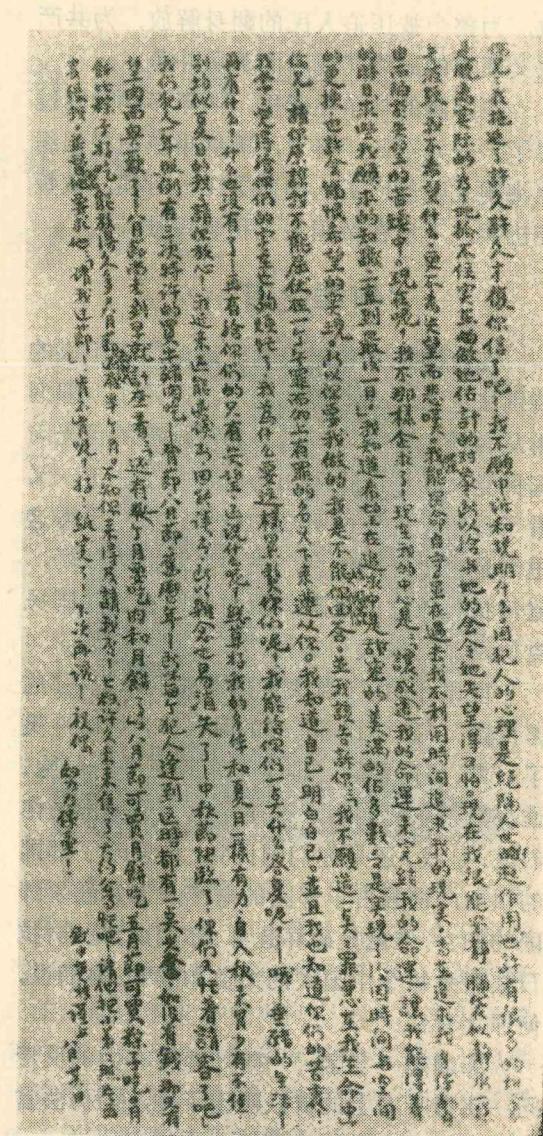
“不愿造一点点罪恶 在我的生命中”

在敌人种种威胁利诱的卑鄙伎俩面前，郭纲琳不但毫不动摇，而且斗志越来越旺。敌人黔驴技穷了，只好胁迫郭纲琳的哥哥来劝说她“悔过自首”。

郭纲琳的哥哥来到监狱。郭纲琳一听到哥哥的话音，就斩钉截铁地说：“你如果要帮助敌人在精神上来枪毙我，我便不是你的妹妹了。我是相信真理的人，我是热爱我们祖国的人。现在国民党达官贵人最敬畏的洋大人我还不怕，难道我会怕起他们的走狗的走狗吗？死，我是从来不怕的，人生总是要死一次的，但要死得有意义，有价值。”

哥哥的劝说，被她一番义正词严的回答拒绝了。

时隔不久，她的哥哥又准备用金钱买通国民党反动派，保郭纲琳出狱。哥哥把这



图三 郭纲琳狱中给哥哥的信

个打算写信告诉了她。郭纲琳立即给哥哥写了回信。信中坚定地说：“现在我很能安静”，“我不能屈伏（服）在一个无罪而加上有罪的名义下来遵从你”，“我不愿造一点点罪恶在我的生命中。”（图三）这掷地有声的几行字，写出了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事业宁愿把牢底坐穿的坚贞献身精神。

“只有学得好，才能更有 效地打击敌人”

郭纲琳在监狱里从未放弃过斗争，也从未放松过学习。她常说：“只有学得好，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又说：“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革命只凭忠心、凭热情是不够的，必须学会战胜万恶的敌人的本领。”开始，她尽可能买进一些狱中允许阅读的书刊，和同志们一起阅读，并且一起讨论一些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问题。后来，她发现狱中不禁止带入外国书籍，就高兴地对难友们说：“在监狱里，还可以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这倒是未料到的。只要我们掌握一门外国语做工具，便可以大学革命理论了。”她托兄嫂买了不少外文书刊，如饥似渴地学习外文，阅读英文、日文版的马列主义原著。她不但自己刻苦地读原著，还热情地帮助别的同志学习。她在给兄嫂的信里写道：

“让我（用）能得着的时日，求些我愿求的知识，一直到最后一日。”（图三）

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使郭纲琳更加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增添了捍卫马列主义的热情和勇气。

一天早晨，看守们把牢门逐个打开，大声喊叫“出来，出来！上‘马列主义批判课’！”

“什么‘马列主义批判课’，我们不懂！”郭纲琳说。

“胡说！统统出来！”看守直着嗓子大叫。

“我们不去，叛徒才去！”郭纲琳带头喊。

“我们不去，叛徒才去！”难友们也异口同声地说。

就这样，敌人诱上“马列主义批判课”的阴谋失败了。看守又强迫大家唱伪“党歌”，郭纲琳却带头高唱起《国际歌》来。

敌人对郭纲琳非常恼火，把她关在一个单独的牢房里，企图隔绝她和同志们的联系。但是，这有什么用呢？雄壮的《国际歌》声依然不时地从她的牢房里传出来，在监狱上空回荡，在同志们的脑际回荡。

“永是勇士”

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个什么代表来到监狱，找郭纲琳谈话。这个代表假作斯文地说：“青春的生命多么美好！而你却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消磨在监狱里，将自己的生命和青春自行断送。这又何必呢？谁又会记得你呢？谁又会说起你呢？”

郭纲琳立即响亮地回答：

“革命者的青春是美好的，我早已将她献给了伟大的祖国。为了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青春和一切。我并未希望人们记起我，说起我；我只希望他们朝着自由幸福的道路前进，朝着祖国独立的道路前进！你们这些人类的废料是不可能理解我的心情，人民却会理解我今天的斗争的意义。”

那个国民党代表耸耸肩，站起来恶狠狠地说：“你既然不接受党国的训导，你便不要梦想活着出这里的大门……”

从这次谈话以后，敌人对郭纲琳折磨得更残酷了；今天吊，明天打，并且多次威胁要枪毙她。郭纲琳为了表达自己坚贞不屈的斗志，设法找到两枚铜钱，在地上磨呀，磨呀，不知磨了多少个日夜，手指磨破了，血一滴滴渗透泥土，终于磨成了两个铜心。她在一个铜心上面用针刻上“永是勇士”四个字，在另一个铜心上面刻上一个“健”字。

（封三：7）为了马列主义真理，为了党的事业，她决心永不变节，永远做中华民族的健儿、无产阶级的勇士！

“胜利者是应该欢笑的”

当郭纲琳在监狱里进入第四个年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已经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在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反动集团一面在报纸上装模作样地宣传释放政治犯，一面却在暗地

里加紧对革命志士和爱国人士的迫害和屠杀。这时候，郭纲琳被关进“甲所十一号”，这是一个只有被判处死刑即将执行的犯人才被送进去的号子，郭纲琳到此，自知必死。一次，她在刚刚受过敌人严刑折磨以后，用自己的鲜血，在墙壁上写下光辉的誓言：

“立场坚定，为革命而牺牲！拥护真理，为真理而流血！”

敌人再一次对她施用酷刑。敌人怕她大声责骂，就拿来马粪、烂棉花往郭纲琳嘴里塞。当她从昏死状态中醒转来的时候，仍然竭力高呼：“打倒卖国求荣的国民党！”

郭纲琳在遍体鳞伤、全身浮肿、行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激昂地唱起《囚徒之歌》：

磨砺呀，锻炼！

勇敢呀，奋斗！

总有一天，那红旗，

会随着红日照遍全球！

总有一天，那红旗，

会随着红日照遍全球！

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个静寂的黎明，牢房的门突然打开了。看守、宪兵闯了进来，给郭纲琳加上五花大绑。一个法官模样的人宣布：“郭英即郭纲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后又假仁假义地问郭纲琳有什么遗言。

郭纲琳回答敌人的是一阵豪爽的笑声和随之而起的雄壮的《国际歌》声。

法官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弄呆了。他望着郭纲琳镇静自若的神情，不解地问：“你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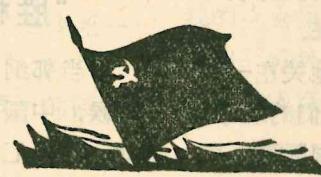
要死了，还这样高兴？”

郭纲琳同志字字有力地说：“你们关了我将近四年，花了你们不少心机，但是你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可见你们是失败了。而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凭了真理，凭了我对人民的忠贞，凭了党给我的教导，将你们一套又一套的阴谋诡计打得粉碎！可见我是胜利了。胜利者是应该欢笑的。今天你们杀死我，中国人民是杀不绝的。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灭亡！你们这些走狗也一定会被消灭！我们的事业正在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中国人民的革命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

暴徒们把郭纲琳押上囚车，一直开向雨花台。郭纲琳沿途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的国民党反动派！”歌声、口号声惊醒了沿途的南京市民。

郭纲琳以自己宁死不屈的英雄行为，证明自己不愧“永是勇士”，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无产阶级的好战士！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革命火种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先烈的革命传统，就是要接过革命火种，保持和发扬“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高举反修防修的大旗，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革 命 的 遗 嘱

——读江竹筠烈士狱中遗书

北京市通县马头公社下乡知识青年评论组

江竹筠同志是我们所熟知的革命烈士，人们亲切地称她“江姐”。最近，我们看到她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写给一位亲友的遗书。这份遗书是在重庆歌乐山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监狱里，用竹签子蘸着棉灰制成的墨汁，写在一张毛边纸上的。当时，江竹筠烈士被禁锢在黑暗的牢房里，经常遭受酷刑的折磨，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而她所写的这封遗书，却没有丝毫忧伤的情感，相反地，充满了对反动派的极大蔑视，表现了对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心。尤其可贵的是，烈士在遗书的最后几行，谈到了对自己三岁幼儿的嘱托：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要娇（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言语不多，却是语重心长。这不仅是对烈士自己的孩子云儿的嘱托，也是对我们整个革命后代的嘱托。这是一份珍贵的革命遗嘱（图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烈士在遗书中对革命后代的嘱望也主要是这两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这不就意味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

矣”，这不就意味着要培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一个艰苦奋斗精神，这两条对每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缺一不可的。我们只有



图一 江竹筠狱中遗书

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树立这样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够做到不断革命，奋斗不息，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激发艰苦奋斗工作作风的前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培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则是执行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保证。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征途上，长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复杂激烈的斗争。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资本主义倾向斗，与修正主义路线斗。只有斗掉自身的娇气，培养起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坚韧不拔，排除艰难险阻，越过征途上的“万水千山”；才能抵挡住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反修防修，才能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江竹筠烈士身上也可以看得清楚。江竹筠烈士出身贫苦，当过童工，从小过着连粗服淡饭也难以得到的苦日子。她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从来没有被娇养过，很早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习惯。后来，她接受了党的教育，胸中树起了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迅速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样，她就能更加自觉地以艰苦奋斗的精神从事革命工作。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蒋管区，她不顾个人安危，克服重重困难，经常夜以继日地印发、传递党的重要指示和革命胜利的消息；她深入工厂、学校，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她筹办一批批军火、药品，从城市运往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惮辛劳。当她的爱人、亲密战友彭咏梧同志不幸被捕遇害，被“悬首示众”的时候，她没有哭泣，没有“被头挂退”，而是鼓励同志们“重新检讨一下，我们再来！”一九四八年夏天，由于叛徒出卖，

她落入了敌人的魔掌。在牢房里，万恶的敌人用竹签子钉进她的十指，然后把沾满血肉的竹签子拔出来，再钉进去。野兽们都累得精疲力尽了，而她始终咬牙顶住，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当敌人对她最后下毒手的时候，她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地向难友告别，昂首挺胸地走向开赴刑场的囚车，慷慨就义。江竹筠烈士能够这样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这是与她具有共产主义的坚定革命信念、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分不开的。江竹筠烈士在就义前的遗书中特别对我们后代提出上述的两点殷切希望，决非偶然，这正是她亲身革命实践经验的一个总结。

江竹筠烈士在遗书中说：“粗服淡饭足矣。”“足矣”这两个字更值得我们好好领会。的确，具有共产主义高尚革命理想的革命者，在个人生活上总是简朴的，知足的。因为他们的奋斗目标是要消灭一切压迫和剥削，解放全人类，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谋福利，因此决不计较个人的享受待遇。在生活中艰苦朴素，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一个鲜明的本色。当然，我们说，对个人生活要知足，并不是说不要生活的改善，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苦行僧，我们要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其中自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所要的生活改善和提高，是建筑在共同富裕基础上的普遍改善，是随着生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壮大的共同提高，而不是追求个人吃穿享受，贪得无厌。雷锋同志说得很对，我们所持的态度应该是：“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摆脱一穷二白状态、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受苦受难的情况下，我们在生活上就不能要求过高，应该以粗服淡饭为满足。我们知道，只有这样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生活上知足，不讲享受，一心为革命，才能把精力集中在工作学习上，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反之，如果讲吃讲穿，

贪求无厌，就必然导致艰苦奋斗精神的丧失，革命意志的衰退，甚至会蜕化变质，完全背离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滑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

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同志问：过去旧社会，有些剥削阶级不是也在他们的“遗嘱”、“家书”中，叮咛自己的子弟要“克勤克俭”，不要奢侈挥霍吗？孔孟之徒不是也讲什么“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吗？应该怎样同他们划清思想界限呢？我们讨论后认为，剥削阶级所标榜的这一套与我们所提倡的有本质的不同。第一，我们提倡艰苦奋斗，反对追求个人享受，是为了谋求人民大众的幸福。而有些剥削阶级要他们的子孙“克勤克俭”，不要奢侈挥霍，目的是要保住自己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家产，以便能够永远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第二，孔孟之徒，作为剥削阶级的代言人，鼓吹什么“知足”“安贫”，主要的是为了麻醉劳动人民，诱骗劳动人民“听天由命”，安分守己，甘受剥削。他们虽然有时也吹嘘自己“安贫乐道”，但是他们的“道”，是复辟之道。他们说要“安贫”，不过是对暂时困苦的忍耐，是“克己复礼”的一种手段，以便重新爬上反动统治者的行列。剥削阶级本性决定他们必然贪得无厌地追求享受，无限地扩大剥削，而不可能真正做到“知足”、“安贫”。在这方面，孔老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大骗子一方面假惺惺地叫嚷什么“安贫”，另一方面他自己却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满脑子升官发财的思想，一心要复辟奴隶制；他在周游列国、游说诸侯、谋求官职的时候，就见钱眼开，大收财礼贿赂。孔老二分明是个追名逐利、贪得无厌的伪君子，哪里是“安贫”、“知足”呢？由此可见，剥削阶级所鼓吹的这一套，对他们本阶级根本是行不通的，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只有我们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才真正富有高尚的革命理想、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这是无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江竹筠烈士在狱中的时候，难友们曾经给她写了一首颂歌，其中有一段是：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亚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的典型！”

是的，从江竹筠烈士的遗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她身上所体现的，正是无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她不愧是中华儿女的一个优秀典型。

江竹筠烈士英勇牺牲在全国解放前夕，那个时候，新中国的曙光已清晰地展现在她的眼前。事隔二十多年的今天，我们面对今天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捧读烈士的遗书，回顾自己下乡务农的战斗历程，对革命先烈的遗嘱感到十分亲切。我们从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革命的目标产生革命的动力。正因为我们抱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理想来到农村，这才使我们能够自觉地吃苦，以苦为荣。而在农村的紧张激烈的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也进一步培养了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更加坚定了我们的革命信念，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受住各种考验，坚持乡村干革命。

当前，“到处莺歌燕舞”，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积极地投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愤怒地声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深入批判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下乡知识青年一定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牢记革命先烈的遗嘱，进一步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贡献出自己火红的青春。

血迹斑斑的图画

——介绍大连寺儿沟的“红房子”

旅大市三十五中学党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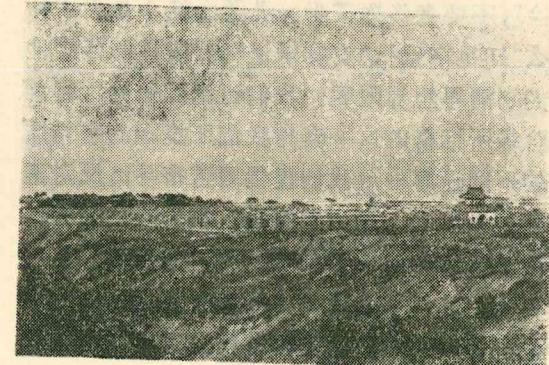
在辽宁省旅大市大连东端的寺儿沟，有一片红砖建造的房舍，密密麻麻，高矮不齐，一直延伸到南山脚下。这就是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旅大时修建的码头工人宿舍。它当时的全称是：“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常住华工收容所”。日本垄断资本家美其名曰“碧山庄”；广大码头工人则称它“红房子”，因为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浸透了中国工人的斑斑血迹。

解放后，“红房子”一带成了海港工人家属居住区，昔日的旧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红房子”本身却作为历史的遗迹保留下来，成为帝国主义残酷蹂躏、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证和教育人民群众的反面教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它又成为广大工农兵忆阶级苦、民族苦的会场，批“克己复礼”、复辟倒退的战场。

“红房子”的来历

“红房子”占地总面积为三万八千三百七十七平方米，建筑物的绝大部分是工棚，近百栋。此外，有一些附属建筑，其中包括设在北部的“华工事务所”、“米面配给所”；设在南部的天德寺、土地庙和“万灵塔”；设在西部的日本监工住宅；设在东部的四百多个工头住的小院落；“红房子”的中部是“碧山庄医院”。工棚外围修建起高大的石基围墙。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围墙加高，并且设置了铁丝网。围墙的外面，有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把头开的几十家当铺、烟馆、赌局等，把“红房子”团团围住。（图一）

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帝国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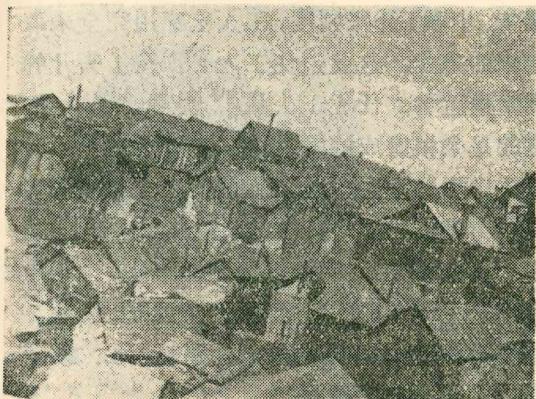


图一 “红房子”远景

义取代了老沙皇，霸占了旅大。为了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加紧掠夺中国人民，进而实现其由来已久的独霸中国的野心，日俄战争结束的第二年，日本政府就急忙下令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用以控制我国东北的海、陆交通和其它经济命脉。日本政府选中大连港，做为吞吐工具。由于扩建码头，再加上装卸频繁，大连港码头的用工量急剧增加。为了解决劳动力的不足，“满铁”成立了“招募华工”的专门机构“福昌人夫配给所”，后来改为“福昌华工株式会社”。

“福昌华工株式会社”派人窜入中国关内城乡，特别是人口稠密的山东、河北等地，招募廉价劳动力“入满”。这些招工的工头到处贴广告，做欺骗宣传。人们只要向他们通报个姓名，或者领到一点预支的衣服，便立即成了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被工头驱赶着强行装上车船，运到大连码头。现在仍然在大连港东区工作的老工人生德明同志，就是这样被骗到“红房子”来的。

生德明的老家在山东济宁。以前，父亲和哥哥闯关东，被日本帝国主义头目折磨死



图二 工棚一角

在满洲里，全家几口人生活的重担就落到他一个人身上。一九四〇年，济宁连遭旱灾、虫灾，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抢掠，日子过不下去了。第二年正月，生德明外出找活路，路过一家店铺门口，见门外挂着一面小白旗，旗下贴着“招工广告”。生德明刚想上前看一看，一个猴一样的家伙从屋里走出来，连忙说：“老弟，大连码头招工，到那里吃的是白面馒头，住洋楼，活很轻快，每月净剩银洋五元。”生德明心想吃住好坏倒没什么，只要能挣几个钱养活老娘和弟弟、妹妹就行了。生德明决定和母亲商量一下，回家一说，母亲不同意。第二天，生德明又来到店铺，打算摸一摸招工的底，回去再说服母亲。工头一见生德明，急忙迎了出来，一脸奸笑，连推带拉地把他弄进店里，问他姓名、年龄，生德明不加思索地一一回答。还没等生德明问大连方面的情况，那招工头就把一套衣服往桌上一放：“拿去穿上。”生德明说：“我还得回去和娘商量。”说完，刚想往外走，不料那个家伙拦住去路，把脸一沉：“走？往哪走？进来容易出去难。”生德明说：“你怎么不讲理，我进店一没报名，二没沾惹你，为什么不让走？”旁边一个“账房先生”用笔敲打着本本说：“你没报名，你的名字怎么在这上头啦？”接着，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把生德明强推硬拉到后院。就这样，在一九四一年二月的一个傍晚，生德明和几十个贫苦农民，在招

工头的严密监视和驱赶下，在大连码头下了船，进了“红房子”六十三号工棚。

“红房子”里的工人就是这样来的。

据日本出版的小册子记载，仅一九四〇年六月到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年零一个月里，从山东一省招骗来的“华工”就有一万七千四百九十六人。“红房子”里，最多时住过四万五千多工人。在矮矮的二层楼的窝棚里，搭起四层床铺，工人都得弯腰屈背才能够爬到自己睡觉的位置。每一栋工棚要住上三百到四百个工人（图二）。

特务和监工的天下

日本帝国主义对招募来的“华工”，要进行登记编号，还要留下照片和指纹，然后才发给“劳动票”。在当时所谓“关东州劳务协会”里的特务，对“华工”经常审讯，查验手掌，或者突然喊声口令。如果手掌没有老茧，或者对其口令有反应，便认定是“不良华工”，加以迫害。

设在“红房子”北部的“华工事务所”，是由日本特务直接出面统治工人的机构。日本特务通过盯梢、偷听，监视工人的行动。此外，还设有检信站，检查工人的往来信件。遇到哪个工人有所谓“不轨”的行为，立即捕捉，严刑拷打。工人出入码头，要进行搜身，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地冻天寒，工人都要排成长队等着检查。一年冬天，工人周殿发家里捎来口信，说妻子病重，要他买点药寄回家。周殿发从别人手里借了点钱，买几盒丸药带在身上，打算求熟人捎回山东老家。下工的时候，周殿发身上带的药丸被搜了出来，日本头目硬逼他承认是在码头偷的。周殿发据理申辩，日本头目不由分说，操起皮鞭就是一阵毒打，接着放出狼狗撕咬。周殿发被咬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是始终不屈。最后，日本头目将周殿发捆在电柱上，一桶桶凉水从头上浇下来。当他被解下来的时候，脊背上的大片皮肉被粘在电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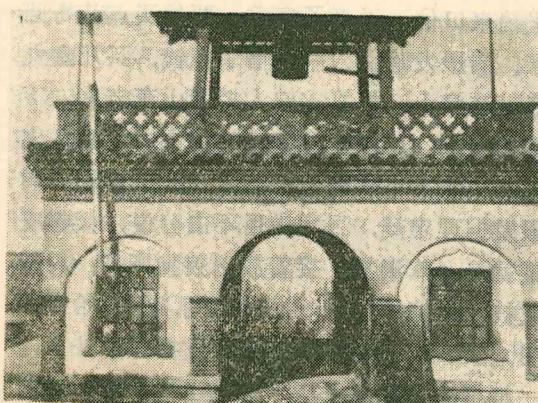
“红房子”里管制工人的是工头。每六十人设一工头。管劳动的叫二头，管内务生活的叫先生。这些人的薪俸完全出在工人身上。日本帝国主义供认，这种工头制是“依据资本主义集中管理和封建时代亲分乾分关系综合起来”搞的所谓“合理劳动统治制度”，既可以掌握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又可以“防止劳资纠纷”。这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的血腥统治。

牛马不如的生活

住在“红房子”的工人，绝大部分是装卸工人。码头上装卸作业，完全靠工人用肩背来扛挑抬。就拿干“煤牌”的工人来说，成天肩挑二百多斤重的大煤筐，爬着二层楼高的窄桥板，真是一步一颤，步步淌汗，随时都有滚落到大海去的危险。码头上的伤亡事故层出不穷。据日本当局大大缩小了的统计，从一九四〇年四月到一九四一年三月，工伤三千五百四十六人次。

码头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平均在十四个小时以上。凌晨四点钟，天德寺的钟声就响了起来(图三)，工头从四面八方涌入工棚，催逼工人起来上工；工人一出工棚，就必须到晚上七点才能回来；甚至二十四小时的连续作业，也是家常便饭。

工人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饮食非常差。在“红房子”里实行“三大节”(春节、



图三 天德寺钟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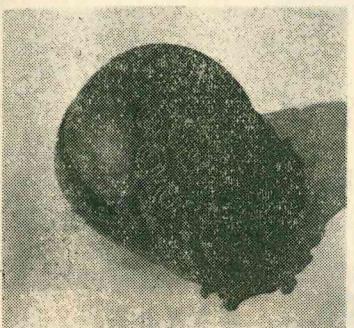
端午、中秋)开帐制度，工人吃穿用完全采取挂帐的方式，这就迫使工人必须在工头开的食堂里就餐，任凭工头从中盘剥。工人们吃的是杂粮磨成的发霉的面粉和橡子面。工人出牛马之力，吃猪狗之食，因此很快丧失了劳动能力，有些人被折磨得悲惨地死去。有些人则被踢出门外，流浪街头。正象当年这里流传的一首歌谣所控诉的那样：“活着当牛马，病老赶出来。路上死，露着埋，狗肚子，是棺材。”

即使有极个别的工人，由于过度地省吃俭用，偶尔攒下几个钱，也别想轻易拿出去。有一年春节结帐，七十五号工棚工人张德福余下三十元钱，这是他十五年一滴血一滴汗攒下的钱，打算带回家去。工头赵芳奎发现后眼红手痒，夜里窜入工棚，强迫张德福推牌九(一种赌钱的手段)。张德福不干，工头就以“私通八路”、“想逃跑”相威胁，终于把张德福用血汗攒下的钱刮光。

日本帝国主义招募“华工”时所宣传的“吃白面馒头，住洋楼，活很轻快，每月净剩银洋五元”的情况，原来就是这样。

假慈悲的背后

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日本帝国主义在对“红房子”工人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的同时，又竭力利用孔孟之道和宗教迷信活动，在精神上麻醉、愚弄广大码头工人。他们大肆宣扬“天命”，力图使工人相信，他们过的牛马不如的生活，都是天意安排，命中注定，反抗不得。为了这个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在“红房子”精心安排一个迷信活动场所，利用山脚下的天德寺，请来了道士、和尚，大搞迷信活动。每年阴历正月、端午节、中秋节，特别是七月十五的什么“鬼节”，这里香烟缭绕，“满铁”、“福昌”的日本头目也赶来参拜“南



图四 天德寺的大型木鱼
以“华工”头子的名义，向天德寺赠送“克己复礼”、“佛光普照”的巨匾和大型木鱼(图四)。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利用孔老二的一套和封建迷信来愚弄中国工人。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下，从“红房子”的建造到一九四五年的三十多年中，有十几万码头工人被折磨而死。为了掩盖罪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这里修建了“万灵塔”(图五)。“万灵塔”在天德寺的东侧。塔的基石高六尺八寸，塔高二丈一尺。塔座下面是两间房大小的地下室，存放着死难工人的名片。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日(所谓“鬼节”)，举行什么“盂兰盆会”。这一天，塔前搭上道士念经棚，塔的周围挂满了布幡。日本头目和华工头子在乐曲声中，前来“致哀”，“默默祈祷”，宛如一群披着羊皮的豺狼。晚上，还要举行所谓“超度”，就是把死难工人的名片装在一只预先扎好的纸船上，放到海里，说是让死



图五 “红房子”的万灵塔

者的灵魂一帆风顺地回到自己的故乡。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这种拙劣表演，只能是欲盖弥彰，更加暴露了他们凶残、毒辣而又阴险狡猾的法西斯本质。

设在“红房子”中部的“碧山庄医院”，表面上是给工人医病治伤的慈善设施，实际上却是直接屠杀工人的场所。日本监工和汉奸工头发现哪个工人年老体弱，或者生了一时治不好的病，就强行送进医院，打上“催命针”，往活底棺材里塞。例如，有个名叫孙玉兴的工人，得了伤寒病，被弄进医院。日本医生给他打了“催命针”，就往棺材里按。孙玉兴的儿子在旁哀求说：“我爹还能好，我把他背走吧！”日本医生一脚把孩子踢倒，急忙把孙玉兴装入棺材，抬到荒郊野外，把棺材的活底一抽，尸体就扔下喂野狗了。一九四二年三月到六月，“红房子”地区发生瘟疫，医院不但不去抢救病人，而是发现谁有疲惫的神态，立即拖出来，用冷水冲击，不少工人被活活折磨死。三个月时间，死去工人三千五百二十人，最多时一天死一百六十六人。工人愤怒地称“碧山庄医院”是杀入场。

* * * * *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红房子”，就是这血迹斑斑的图画的一个缩影。刘少奇、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者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社会主义新中国就要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人间地狱。“红房子”，正象征着出现这种反革命复辟后不可避免的悲惨情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压榨、奴役，并没有使他们屈服。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工人不断地通过公开罢工、暗地里惩办日本监工和汉奸工头等斗争方式和手段，同敌人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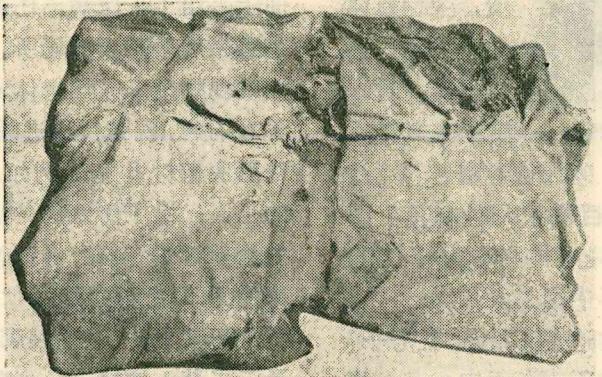
红军衣

— 写在东兰县革命斗争史展览馆

广西师范学院政治系七四年级学生 蔡向阳

粗布红军衣，
微黄沾血迹；
线粗手工细，
补钉叠缀齐；
战争岁月里，
战士亲手织。

* * *
红军老战士，
穿它打游击；
血汗绘异彩，



(红军衣的图片是东兰县文化馆提供的)

弹洞巧装饰。
层层补钉密，
军衣更朴实。

* * *
眼观红军衣，
心中激情起；
继承先烈志，
战斗无穷期。
接过传家宝，
开拓新世纪！

针锋相对的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逃出敌人的魔窟，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和全国人民一道，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把日本侵略者赶了出去，把这页血迹斑斑的图画翻了过去，使中国发生了天地翻覆的变化。

今天，“红房子”里的奴隶已经作了社会主义祖国的主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威胁。回顾一下“红房子”的历史，想一想它所代表的旧中国，就会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勇敢战斗，让“红房子”这样的人间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封三图片说明

① 北京卫戍区某部一连干部辅导战士学习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② 北京卫戍区某部一连拉练回到西柏坡，老贫农热情欢迎子弟兵。

③、④ 当年西柏坡军民联防的遗址和用过的马灯。

封底图片说明

① 北京卫戍区某部一连（原为六连）荣获的“保卫毛主席最光荣”锦旗。

② 西柏坡贫下中农赠给北京卫戍区某部一连的“人民军队爱人民”锦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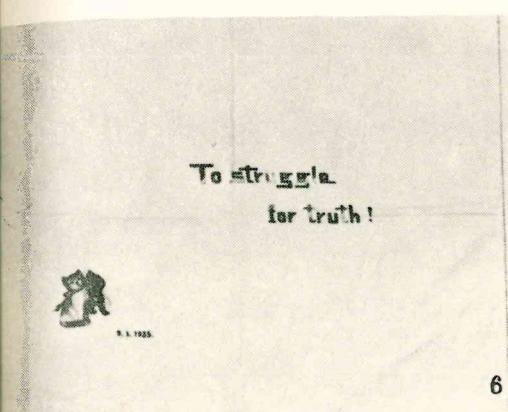
⑤、⑥ 郭纲琳烈士在狱中绣在枕套上的大雁和英文“To struggle for truth”（“为真理而斗争”）。

⑦ 郭纲琳烈士在狱中磨制的两个铜心：一个上面刻着“永是勇士”，一个上面刻着“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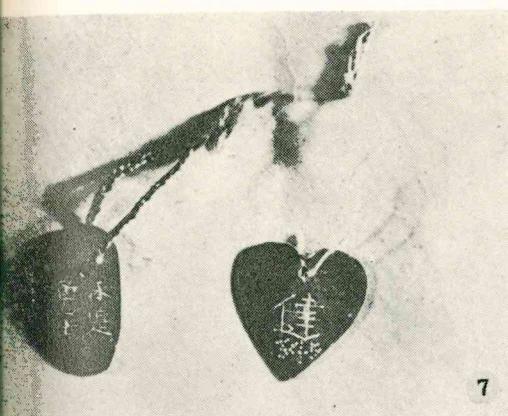
⑧ 郭纲琳烈士在狱中绣在手绢上的红心和英文“Long live”（“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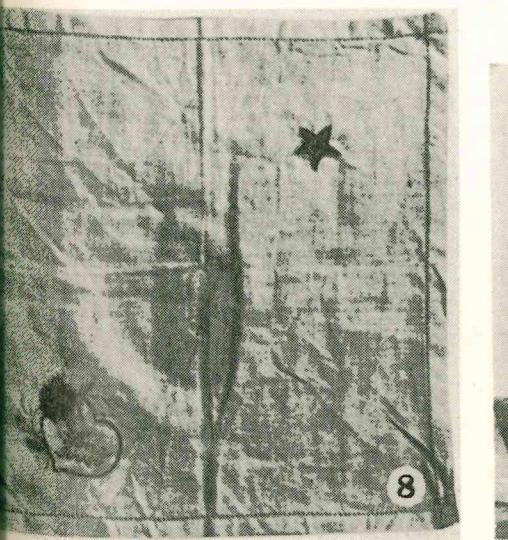
5



6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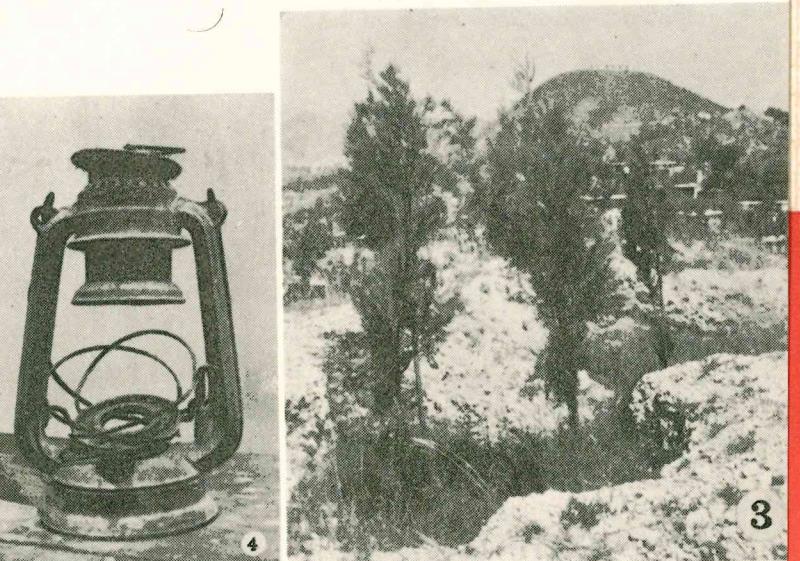
8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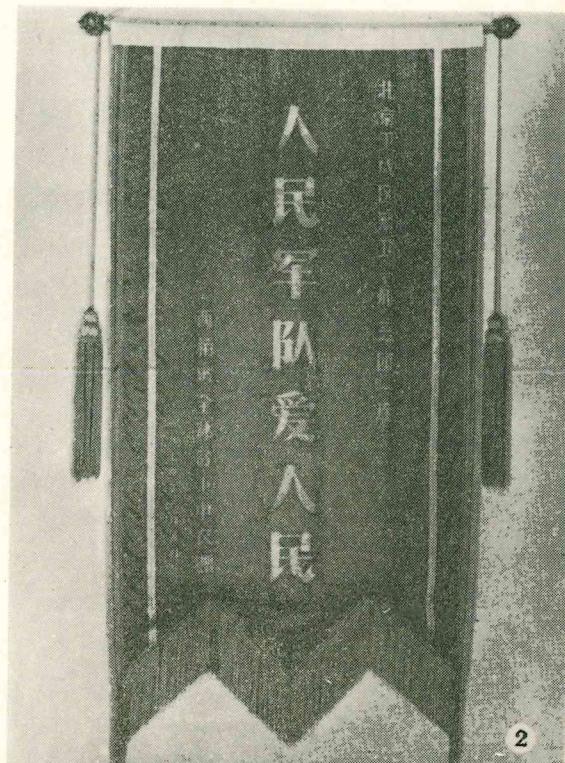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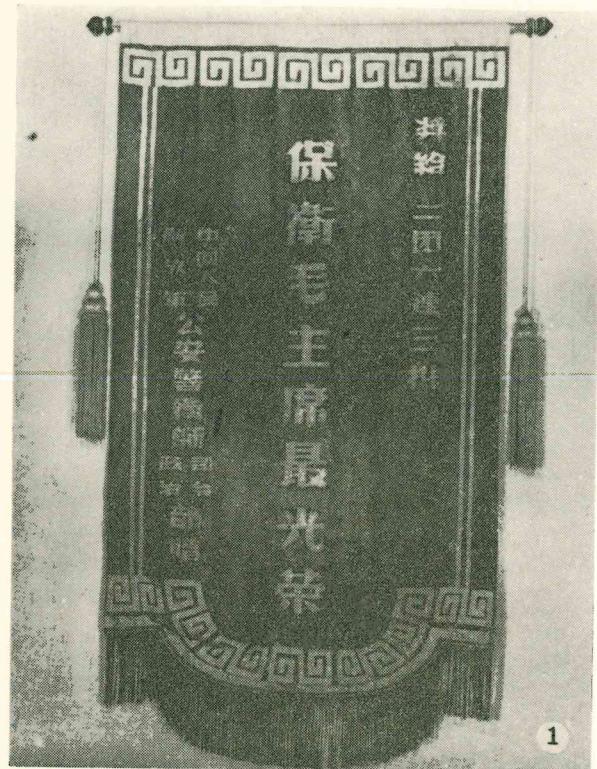


2



3

革命文物



革命文物

双月刊

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一九七六年四月出版

编　　辑　　者　　革命文物编辑部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电话44.6397)

出 版 者 生 物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北京新華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邮政局

志及有关事项。北京邮政局
订购外，全国各地邮政局

全国各大邮局
国外总发行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際书店
(北京 399 信箱)

(北京 350 倍相)

本刊代号：2-29 定价每册0.20元

一九七六年 第2期